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地 廿

羅曼蘭著

陳作樑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地 甘

著 蘭 羅 曼 羅
譯 樑 作 陳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地 甘

譯樑作陳 著蘭羅曼羅

路南河海上

五 雲 王 人 行 發

路南河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刷印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二十年二十二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MAHATMA GANDHI

BY ROMAIN ROLLAND

TRANSLATED BY CH'ENG TSO LIANG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3

All Rights Reserved

譯者序

這本小書的路線是這麼來的：牠的主人是在印度領導民衆的運動，牠的作者是法國有名的作家，原譯本是由法文翻爲英文的，如今，我更把這種由西方的觀點觀察東方精神的印象，由英文譯本搬回到中國來。

如一般人所認識的，甘地是印度獨立運動的領袖，但是這書所給與我們的是一個完整的精神的力量之代表者；倘如沒有甘地，印度也許有政治手腕比甘地更爲敏捷的領袖出來領導，而印度的獨立運動也許是早已成功了；但是雖然她成功了，她必不能給世界以這麼深的印象，而求得牠的偉大的同情。

所以，印度，在甘地指導之下的印度，將爲一種新的力量的源泉；她的愛和犧牲的精神的表現，將給任何革命運動以其根本的動力。

這便是我們東方的精神。我們將以愛和犧牲掛起我們的偉大的旗幟，而給與資本主義將

因自己的罪惡而傾倒的世界以一種美麗和平的新的生命。

十九, 二, 二十日。陳作樑序於燕京大學圖書館。

甘地

第一編

1.

一個小而瘦弱的人，一個瘦瘦的臉孔，兩個大而凸出的黑眼珠，頭上戴一頂白色的小帽，身上穿一套白色的粗布衣，赤着兩足。他食的是飯和果實，飲的單是清水。他在地板上睡覺——睡的很少，只是不絕地工作。他的軀體，他好像是絕不留意牠。他並沒有什麼驚人的奇相——除了他有一種「無窮的忍耐和無窮的愛」的表情。當披爾遜君 (W. W. Pearson) 在南非洲遇見他的時候，不加思慮地他便想到阿栖栖 (Assisi) 的聖法蘭西斯 (St. Francis)。他有一種差不多和孩童一般的天真。⊙他的態度是仁慈和虔敬，就是對待敵人的時候，也是如此。⊙並且，他又有一顆毫無污點的誠心。⊙他的謙遜和不敢臆斷的態度，使他有時好像是一個怯弱和無決

斷力的人。可是，你能覺得他有一股不可屈服的精神。他不做妥協的事，他從未想掩藏過失。如果他錯了，他並不怕承認他是錯。權術，他是不曉得的。他避去以口才動人，或者說，他從未想及這件事，他自然而然地，避開專為歌頌他而組成的民衆團體。說的文雅一點，「他是煩厭那贊頌他的民衆。」^②他不信任「多數」的人 (majority)，他怕羣衆的暴政和無所顧忌的情感。惟是在「少數」的人 (minority) 之中，他才覺得舒適，而在他獨自靜思以聽其內心的微音的時候，他才得到最大的快感。^③

①安得魯君 (C. F. Andrews) 說「他笑時如像小孩，他贊頌小孩。」

②很少人能不為他的人格所感動。他的最深刻的敵人見他那樣優美的禮節，也不得不以禮貌相回答。(杜克君 J. J. Duke 說的。)

③事無大小，苟離開真理，則彼必不能容忍。安得魯 (C. F. Andrews) 君說的。

④「他並不是一個熱情的演說家，他的態度是沉靜和明睿。他特別能感動那有智慧的人。他的明睿使他所討論的題目毫無隱昧。他說話時的音調，並不變更，但是他所說的話，都

充滿着熱誠。他從不用手裝作種種姿勢，實在，他連手指也極少動牠。但是他的明達的意見，用簡潔和正確的字句發表出來，便足使人信服。在未把一個題目說的極清楚了之前，他從未把牠放過。」（杜克君的話。）

⑤見一九二二年三月二日的印度青年。

這個人，便是那鼓起了三兆人民的革命，搖動了英帝國的根基，和把過去二千年所積聚的最強的宗教原動力引入於人類的政治中的人。

2.

他的真名是甘地摩罕達斯卡藍成德 (Mohandas Karanchand Gandhi) 在一八六八年十月二日，他生於印度西北部的一個半獨立省，在奧曼 (Oman) 海岸的一個城邑，叫做坡班達爾 (Porbandar)，「名叫做「白城」。他所從出的宗族，本是一個勇敢和活潑的族。族中的特性，崇尚實際，又具有商業的技能，從亞丁 (Aden) 以至三給巴爾 (Zanzibar) 的一切貿易，都是該族的人創設經營的。迄於今日，這族中的人因為內爭而分為兩派。甘地的父親和祖父都是人民

的領袖，都是因為他們的獨立的精神而受窘迫。他們都是受迫而致逃亡，他們的生命，都是在危險中度過。甘地的家庭，頗稱富裕，屬於社會中的農民階級，然而不是超等的種姓 (caste)。他的雙親都是印度教 (Hinduism) 中耆那派 (Jain) 的信徒。這一派的教門，承認亞喜米沙 (ahimsa) ①——不殺害生物——為牠一種基本的教義。這條教義，便是甘地所要勝利地宣傳於全世界的主義。耆那教徒相信達於神的道路，是愛而不是智。甘地的父親平素甚為慷慨，不以財富和物質上的價值為重，所以他把他的家財，幾乎全數付於慈善事業，並沒有留什麼東西給他的家人。甘地的母親是一個甚虔敬神的婦人，類似聖依利薩伯 (St. Elizabeth) 之再生為印度教人 (Hindu)。她禁食，濟貧，和看護病者。在甘地的家中，羅摩衍那 (Ramayana) 是逐日宣讀的。他的第一個教師是一位印度教人，他教他背誦維士努 (Vishnu) ②。在後日，甘地懊悔自己未能做一個更高深的聖斯克利特 (Sanskrit) 的學者。他對英國教育的抱怨中有一條便是說牠使上人失去了他們自己的語言的寶庫。可是，甘地仍是一位印度經典的高深學生，雖然他只是讀吠陀

(Vedas) 和優婆尼沙曇 (Upanishads) 的譯本。①

①「亞」是「不」的意思；「喜米沙」是「傷害」的意思。故此，亞喜米沙便是不傷害一切的生物不暴動。這是印度教的一種最古的概念，耆那派的創教者摩訶維刺 (Mahavira) 說過，釋迦和維士努的門人都說過。

②他在坡班達爾 (Porbandar) 的小學讀至七歲，才入耆治柯 (Rajkot) 的公學，至十歲。及後即入卡楊雅哇爾 (Katyavar) 之高等學校，至十七歲，才入亞馬達巴德 (Ahmedabad) 的大學。

③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三日，甘地在帕里亞人大會中演說時，述及他小時的生活。

在他小時，他曾經過一回嚴重的宗教之危機。看厭了印度教 (Hinduism) 人有時執行的拜神禮節，他便變為——或者他想他自己已變為——一個無神者。為因要證明宗教對他並沒有價值，他和幾位朋友甚至於食肉，這是教人一種褻瀆神最利害的舉動。因此，甘地便害上了瘰癧和脫疽的毛病，差不多絕了他的生命。④他在八歲訂婚，在十二歲結婚。⑤在十九歲，他被送到英國倫敦大學的法學院去完成他的學業。在他離開印度以前，他的母親命他立三個耆那教的

誓戒酒，戒肉，和戒色。

①在很久之後他告訴杜克 (Joseph Duke) 君說他由於食肉所受的痛苦。他失眠，和覺得像是一個殺人的凶手。

②可是，他并不贊成童婚。他以童婚足以弱種為理由，對牠作一回反抗的運動。雖然如此，在例外的情形中，他說這種在雙方的個性還沒有固定以前而訂定的結合，能在夫婦之間，造成一種特別美的同情和和協的關係。甘地自己的妻子便是一個可羨慕的例。甘地夫人以一種認定志向的決心和不可克服的勇氣，分擔甘地的一切訟事和危難。

他在一八八八年的九月抵倫敦，起初幾個月，飄遊無定，花費了許多時光和金錢，想使自己成爲一個英國人。及後，他即俯就苦工，嚴格地規律自己的生活。有幾位朋友送他一部聖經，但是他還未有到那能明瞭牠的時候。可是正當他住在倫敦這個時光，他第一次覺出了巴格哇季達 (Bhagavad Gita) 的美麗處，而傾心於牠。這便是那已經被放逐的印度人所尋求的光明，牠恢復了甘地的信仰。他覺得他自己只有從印度教中得救。(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三日的演詞。)

在一八九一年他回歸印度，這是一回很憂悶的歸家，因為他的母親剛逝世，而在他回歸以前并不知道這種消息。回歸後沒有多久，他便在孟買的最高法院中當律師，過了幾年，他覺得這種職業是不道德的，因而便把牠放棄。但是在他當律師的時候，他常常對他的主顧說定，假如中途他覺得他所辯護的案件是不公道的，他有權利可以把牠放棄。

在這期內，他遇着了好些授意於他前途的使命的人物，其中有二人對他的影響最大，一位是「孟買的無冠之王」達達海巴爾斯 (Parsi Dadabhai) 君，一位是哥黑爾教授 (Prof. Gokhale)。哥黑爾是印度的主要的政治家之下，他是提倡改良教育的第一人，而達達海依甘地所說的，却是印度國民運動的真正的創始者。這兩位都是具有最深的學識和智慧，而同時又是絕等的樸素和和靄。e 爲的要磨鍊甘地的青年的銳氣，在一八九二年，達達海教甘地以亞喜米沙的第一部真正的原則，教他實行英雄式的忍耐主義——假如這兩個字眼能够綴合在一起的話——於政治生活，這即是說要用愛來征服惡魔，而不是用惡魔來征服惡魔。在後邊，我們就要討論這個具有魔力的字「亞喜米沙」，牠是印度給世界帶來的最主要的消息。

○這兩位先鋒者受後進的青年所忘却。他們的政治理想已被超過，而他們開路的功績，也被否認。可是，甘地常知道他們的功勞，而真誠地景仰他們，特別是景仰哥黑爾。他對於哥黑爾差不多有一種極深的和宗教上的愛念。他常常說哥黑爾和達達海這兩個人是「年青的印度」所應當尊敬的。

3.

甘地的活動可以分爲二個時期，一是從一八九三至一九一四，活動的地方是在南非洲，一是從一九一四至一九二二，在印度。

甘地在南非洲活動了二十餘年，而歐洲并未加以任何特別的注意，這種事實，可以作我們的政治領袖，歷史家，思想家，和信仰家的不可信靠的「近視眼觀」之證據，因為甘地的心力，組成了一部靈魂之歌曲，這部歌曲，包有需求和犧牲的「緊張性」和「永久性」在我們這個時代沒有可以和牠比並，而且在牠最後的勝利，也是無可比並的。

在一八九〇年至一八九一年之間，有十五萬印度的僑民移殖於南非洲，他們中大多數是

住在納塔耳 (Natal) 白種人恨他們的移住，而政府又用種種阻止亞洲人移殖和強迫那已經移殖在非洲的離開的殘暴的方法，以激進白人仇恨亞人的心。由於有步驟的窘迫，印度人在非洲的生活已至不可支持。他們既負着極繁重的稅，而又受種種嚴酷侮辱的警察法規所約束，並且產業和身體，都可隨便受掠奪和搗毀，毫無有何種保障，這些事，都是在「白人」的文明之下所做的。

在一八九三年，甘地爲一件重要的案件被請到比勒陀利亞 (Pretoria) 去。他對於南非洲的情形，並不熟識，但是他剛到了那邊，便遇見了很多可以表示一般的經驗。甘地本是一個印度的貴族，在歐洲和在英國都受過很優的待遇，而到現在來，他仍把白人當爲他的自然的朋友，可是忽然地，他覺得他自己是一個受大侮辱的人了。在納塔耳 (Natal)，特別是在荷屬的脫蘭斯瓦爾 (Dutch Transvaal) 地方，甘地從旅館和車上被拉出來，幾回受辱，受打和受踢。假如不是他已訂定了留住南非洲一年的契約，他一定立刻跑回印度。在這十二個月中，他磨鍊他的自制的本事，但是他仍是日夕盼望契約滿期，使他可以回歸印度去。可是在他最終將離開的時候，他曉

得南非的政府正豫備通過一條議決案，剝奪印人的選舉權。在非洲的印人都是完全沒有組織，很散漫的，所以一點兒也沒有法子自衛，只可垂手待斃。他們沒有領袖，沒有人可爲領導。甘地覺得保衛他們是他的責任，他覺得離開他們是錯誤。這般一無所有的印度人的存亡，便是他自己的存亡。他決計將身獻給他們，而仍留住非洲。

接着便開始了一幕悲壯的戰爭，一方是精神，他一方是政府的權力和暴力。這時候甘地是一位律師，所以第一步便是要由於法律上的依據，證明排斥亞人條例的不合法。雖然有很毒惡的對敵，他終能達到勝利。關於這點，他請人簽了很多要求書，在納塔爾組織了一個印度國民大會，并組成了一個培成印度人的教育的團體。沒有幾時，他又創立了一家報館，名爲印度民意 (Indian Opinion)，用英文和三種印度語言出版。末了，爲因要使他自已更能盡力爲在非洲他的同胞效勞起見，他決定和他們同化。在約罕涅斯堡 (Johannesburg)，他的業務非常發達（哥黑爾 (Gokhale) 說甘地在這時候每年大概有五千至六千金鎊的入息）有如聖法蘭西斯 (St. Francis) 他把牠捨棄了，以與一貧窮一爲偶。他捐棄了一切的親友關係，以與被窘迫的印人相

處，和分擔他們的患難。他超拔他們，因為他教他們實行不反抗的主義。在一九〇四年，他在德爾班 (Durban) 左近的腓尼斯 (Phoenix) 地方依着托爾斯泰的方法建立了一個農村。○他召集他的同胞，給他們以土地，并使他們立一個「貧窮」的誓。他自己却做那最卑下的工作。

○托爾斯泰給甘地一封信，在印度民意上發表。這封信是一九一〇年九月七號所寫的，在沒有多久之後，托氏便過世了。托氏曾讀印度民意，他很樂意聽關於印度不抵抗主義者的消息。他贊美他們的運動，并說不抵抗是「愛」的法則，是一種組成「人類的靈魂的團結之一部」的氣息。牠是基督的法律，也是世界上一切心靈上的領袖之法律。

我的朋友比羅柯弗保羅 (Paul Biroukoff) 君在莫斯科托爾斯泰的卷案保管所裏面發見托氏給甘地的幾封其他的信。他想把牠和托氏給其他亞洲的領袖所寫的信印為一本書，名為托爾斯泰和東方 (Tolstoi and the Orient)。

一年復一年，這個靜默的農村繼續反抗政府。牠從城市裏面吸引了很多人民，緩緩地頹廢了國中的工業的生命，進行一種像宗教式的罷工，對於這種舉動，暴力，一切的暴力都是無法設

施，有如羅馬帝國的暴力，對着初期基督教徒的信仰一般。可是這初期的基督教徒之中必定沒有幾個能像甘地一樣實行「愛」與「恕」之主義，以至於當窘迫他在危險時反而救助他們。無論何時，倘如南非的政府陷入於危難的時候，甘地必停止印人不參政的運動，而自薦他的幫助。在一八九九年，當波耳（Boer）戰爭的時候，他組織一隊印人的護傷隊，加倍奮勇地在前敵服勞。當一九〇四年約罕涅斯堡（Johannesburg）發生大瘟疫的時候，甘地組織了一個醫院。在一九〇八年納塔爾（Natal）的土人反叛，甘地組織了一隊護傷隊，並且親身督領。納塔爾的政府為公衆對他致謝。

但是這些純無私利的服務并不能解除白人的恨意。甘地常常被捕和被囚。在他受政府為他在戰爭中的服務而致謝之後，隔了不久，他便受一羣羣衆所鞭打，以至於以為他已死了才離開。在這回事過後，他又被捕并判定徒刑和作苦工。但是沒有一種侮辱或窘迫會使甘地放棄他的理想。反之，他的信仰反因為他的患難而更為強健。他對於他在南非洲所遇的暴力的唯一之答詞便是一本小而著名的書，名為印度自主（Hind Swaraj）（關於這書在後邊我

再爲一回更詳細的討論。這書是在一九〇八年出版，牠是英雄化的「愛」的福音。

○在甘地的演說詞和著作的一五二至一七八頁中，甘地用他的沉靜而滑稽的口調，自己敘述他在監獄中的經驗。

○在一九〇七年甘地受一羣印度人的暴力所攻擊，因爲他的溫和的主張在一部分印度人看起來是很可疑，而同時政府又用盡牠的權力來使他柔順。故此，甘地一方既受那被壓迫者的暴力所傷害，而他方又受那壓迫者的暴力所窘迫。

這戰爭經歷了二十年，在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四年爲牠最嚴厲的時期。雖然在非洲有一部分智識最爲發達和心胸最爲寬大的英國人反對牠，然而南非的政府終於一九〇六年急速地表決一條新的亞洲法。因此，甘地遂起來大規模地組織「不抵抗」的運動。

在一九〇六年九月，有一回大的示威運動在約罕涅斯堡 (Johannesburg) 執行。那集合着的印度人都莊嚴地爲不抵抗的宣誓。在非洲的中國人也和印度人聯合。其他一切亞洲的人，無論是屬於何種何教何支派，無論是富的或是貧的，都同樣充滿着激昂的精神。亞洲人成千地

被投入監獄，監獄住滿了，便投入礦坑。但是對於這些那壓迫他們的主帥斯末資將軍（General Smuts）所稱爲「良心所指的反抗者」監獄好像是一種快樂的所在。甘地有三回被投入獄中，[⊖]其他的人也有爲「犧牲者」的。這運動繼續發展。在一九一三年，便從脫蘭斯瓦爾傳至納塔爾。大規模的罷工，激烈的民衆大會，都相繼發生。成羣的印度人在脫蘭斯瓦爾的街道遊行。因此，非洲和亞洲的輿論都受其激動，而全印度的人民也皆爲之奮怒。印度總督哈定伯爵因爲輿論所拘，終於對南非洲政府提出抗議。

⊖ 杜克君在他著作的末一章，曾說及一九〇八年甘地關入約罕涅斯堡監獄的情形。

那「大魂」（Great Soul）——即「麻哈德麻」（Mahatma，人民稱呼甘地之外號）——

的秘力和不屈不撓的堅決的精神，施其偉大的作用而達於勝利；在英雄化之和平以前，武力終必屈服。[⊙]那最仇恨印人的斯末資將軍（General Smuts）在一九〇九年說他必永遠不取消那害及印人的法則，而五年之後，在一九一四年，終於承認他樂意把牠取消了。[⊙]政府所指派的委員會，在各方面都贊助甘地。在一九一四年，政府通過一條法規，取消每人應納三金鎊的人頭

稅同時又准凡願移住而爲「自由的工人」的一切印度人都可在納塔爾居住。經過了二十年的犧牲，「不抵抗」運動終是勝利。

○有二位英國人，安得魯 (C. F. Andrews) 君和披爾遜 (W. W. Pearson) 君用盡他倆的力量贊助甘地。

○甘地在一九二〇五月十二日寫一篇文章，曾說及這件事。

4.

當甘地回歸印度的時候，他已經有了做領袖的聲望。

從這世紀之發端，印度的獨立運動已漸次迫進。三十年前，有幾位廣達的英人，在他們之中有一位是休謨 (A. O. Hume)，一位是韋德明威廉男爵 (Sir William Wedderburn)，組成了一個印度國民大會 (National Indian Congress)。維多利亞的自由黨更給這國會一個印章，并使印度的要求和英國的主權的要求凝合爲一。可是在這時候，適遇日本打勝俄國，警起了亞洲民族的光榮，因而印度的愛國者使暗恨寇仁公爵 (Lord Curzon) 的挑撥的態度在這

國會之中，有一部分人便組織了一個激烈黨，牠的激進的國家主義却和全國一般的情感相響應。可是到一九一四年大戰發生的時候，那老的立憲派仍在哥黑爾 (J. H. Gokhale) 的領導之下。哥黑爾雖然相信忠於英國，可是他是一個印度的偉大的愛國者。

雖然印度國會為反照一般的情感而贊成自主 (Swaraj) 可是究竟將由何種形式以實行自治，則會員中尚未有一致的意見。有的主張和英國合作，有的主張驅逐英人出印度的國境。有的主張採用屬國的制度，如加拿大一般，有的則主張鼓動印度獨立，模仿新興的日本。甘地建議一種解決的方法。這方法與其稱為政治的，毋寧說是宗教的，然而考其實，却比其他的任何方法都為急進。牠的原則可在印度自主 (Hind Swaraj) 一書中尋得。但是這種解決的方法，既以南非洲的情形為依據。甘地知道非把牠變更，必不適於印度的情況。他并且知道雖然因他到非洲去的緣故，而不熟識印度的情形，可是就是因為他留住非洲，才得證明那無可比敵的兵器——亞喜米沙，不暴動——的力量。故此，他決定研究印度的情況，以求實行亞喜米沙的武器。

⊖ 哥黑爾，甘地所親愛的先生，將逝世之前曾勸甘地在未加入政治活動以前自己先旅行

印度，考察實際的狀況，甘地也答應在一年內不參加主要的政治工作。

在這時候，甘地對英國並沒有敵意。反之，當一九一四年大戰發生的時候，他反到倫敦去組織一隊印度護傷隊。如他在一九二一年所寫的一封信中所說明的，他誠實地相信他自己是大英帝國的一個國民。在一九二〇所發表的一封信「給駐印度的英國僑民」的信中，他又反復說及他這種態度。他說，在過去二九年的政治生活中，沒有一個人像他那麼忠誠地服事政府。他為英國而冒了四次的奇險，而至於一九一九年，他仍誠摯地相信和政府合作。但是現在他不能再這樣做了。

這種情感的變更，并不只甘地一人。在一九一四年印度都被那一種稱為「為公理而戰爭」的虛偽理想所誘惑。英國政府為的是要印度的幫助，而標出那最為漂亮的希望。英國政府知道印度盼望自治，因而說：「印度的自治之允許要看印度對於大戰的態度如何而定。」在一九一七年的八月，聰明的印度政府的文書蒙特鳩（E. S. Montagu）對印度應承將來有一個直接對人民負責的政府。因此便進行協商，而在一九一八年的七月印度總督查姆斯福特公爵（Lord

Chelmsford) 和蒙德鳩君都在一篇擬定改良印度的憲法的正式報告上簽字。在一九一八年的初春，同盟國的軍隊正在一個最危急的時期。在四月二號路易喬治 (Lloyd George) 再致一封告全印度的人民的請求書，而在這同一月的末期，戰事會議在德利 (Delhi) 開會的時候也暗示印度獨立的時光已經近了。全印度一心一意地信托，而甘地也答應英國政府盡忠為英國效勞。印度總共派出了九十八萬五千兵士，并為極重大的犧牲。她很信托地等候着那已經應允了的報償。

這場大夢的醒覺是很可怖的。在一九一八年的冬季，危險已經過去了，而印度所服勞的功績也就忘記了。在簽了停戰公約之後，政府覺得不必再做假了。牠不但不如牠所應許的給印度以自由，而且反剝奪那所有的一切自由。政府的立法院在德里 (Delhi) 開會，在會中所提議的牟力 (Rowlatt) 條例對於這個在很多方面都表出忠誠的證據的國家，與以不信任的侮辱。這種條例的目的，在於確定地實行在戰時所施於印度的防衛條例，組織秘密偵緝隊，言論檢查處，及其他一切如禦敵人的苛虐的壓迫。全印度的怒奮皆一致爆發。革命由此肇端。甘地為牠的首

頭。

在這事發生之前，甘地惟熱心於社會之改良，特別是用心於農人的狀況。在開刺（Kaira），古茶拉特（Gujarat），松班蘭（Champanan）和貝哈爾（Bihar），差不多沒有人留意的，他已把他不久將要用爲「爲國爭鬪的武器」試驗成功。這種武器便是一種主動的情感的不抵抗——即是非「被動的」之謂——主義之意志。這種意志，甘地稱牠爲「沙特雅格拉哈」（Satyagraha），我們在後邊再把牠詳細考論。

直至一九一九年，甘地還沒有參與印度國民運動的主要工作。在一九一六年，柏桑特亞尼夫人（Mrs Annie Besant）加入國民運動，可是不久，那最急進的份子便走在她前面，并在偉大的印度的領袖提拉克（Lokamanya Bal Gangadhar Tilak）的指導下集合。提拉克是一個具有非常的能力的人，他有如一柄三片合成的鐵，一是強健的腦力，一是堅決的志氣，一是高尚的品格。他的智慧或者是較甘地的更爲精銳，或者說，他受東方文化的滋養，比甘地更爲深實。他是一位博學的人，一位數學家，犧牲了一切個人的欲望，以服事國家。他和甘地一般，自己不想出

名，只是盼望他的理想成功，使他可以退出政台，回去作研究科學的工作。在他生存的日子，他是印度惟一的領袖。誰敢說假如他不是在一九二〇年不幸逝世，則將有什麼事情發生呢？假如提拉克不死，則甘地一方面崇敬他的才力，而一方面在方法和政策上又大與之相逆，終必轉為一位在運動中的宗教的首領。在這樣的兩重領導之下，印度是應當如何堂皇地前進！他們必定是直往無前的，因為提拉克能操縱實際上的策略，而甘地則能管轄精神上的力量。但是命運常是與人意相違。這不但是提拉克的不幸，也是印度而至於甘地的不幸。甘地的內心的盼望和他的天賦，比較上更合於為少數道德高尚的份子的首領。他一定樂意讓提拉克為「多數人」的領袖，因為他對於「多數人」從來就沒有信仰。但是提拉克則不然。他是信仰多數的，他是一位天生的數學家 and 策路家，所以他相信數目。他是天生有德模克拉西的性能。直截了當地，他就是一位政治家，把一切宗教的理論都抹在一邊，而不顧牠。他說政治並不是為沙哈斯——聖人，敬神的人——的。這位嚴肅的科學家必定願為愛國而犧牲真理。像他那麼爽直誠實，人格完美的人，也毫無疑慮地說在政治上一切都是公正的。我們或者可以說提拉克對於政治的觀念，有些

和在莫斯科的狄克推多相像。甘地的理想就不是這樣。提拉克和甘地的討論使他們的見解的異點都表明出來。在兩個像他們一般誠實的人中間，自然免不了有不可調解的衝突，因為他們的方法都以他們的信仰為依據，而他們的信仰又是互相敵對的。他們倆互相尊敬，互相景仰。但是假如要決定真理與自由那一件應當為先，則甘地必以真理為先，不但先於自由，而且是先於他的國家，而提拉克却把他的國家放在一切之上。甘地覺得不論他對他的國家的愛如何大，他對他的理想和宗教的信仰——由於真理而表明的——必為更大的。

○甘地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說明他對於布爾薩維克主義的態度。

如他在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一日所說的：

「我和印度相結合，乃是因為我絕對地相信她負有給與世界的使命……我的宗教並沒有地理上的限制。我對牠有一種不可消滅的信仰，這種信仰就是我对印度本身的愛也必為所超過。」（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一日甘地反對武力主義時說的。）

這幾句高尚的話便是我們現在所要敘述的戰爭的關鍵。牠證明印度的福音傳播者

就是世界的福音傳播者，而這位傳播者便是我們中之一人。在四年以前麻哈德麻 (Mahatma) 所肇端的戰爭，便是我們的戰爭。①

① 人類是一體的。種族雖有分支，而那程度愈高的種族，其所負的責任也愈重。（見倫理的

宗教）

5.

我們應曉得當甘地加入政治旋渦為反對牢力 (Rowlatt) 條例的首領的時候，他純是為一種使國家避免戰禍的希望所驅使。革命終是要發生，他知道沒有法子可以避免牠。故此，惟一的問題便是在於把牠導入不暴動的途徑。

為要明瞭甘地的活動，我們應而道他的主義是有如一間兩層不同的偉大的建築物，在下層是那堅固的地基，是宗教的地基在這大而不可動搖之地基之上，建立了政治和社會的運動。這上部的建築并不是那不可視見的地基的理想上的連着物，而是在目前的情形之下，牠是能以做到的範圍內的最完善的構造，簡言之，就是牠是適應於環境的吧了。

換句話說，甘地的天性是宗教的，他的主義的要點也是宗教的。他爲政治的首領，乃是因爲時代的需要，因爲其他的首領已經亡滅，環境使他不得不駕駛這隻大的船渡過這狂風和猛浪，使他不得不表現他的主義於實際上政治的活動。這種發展是很有趣的，但是這建築物的最重要部分乃是那深而堅固的地基，這地基這樣造成，爲的是要等這急速建成的上部建築物頽廢後，再建一座大而堅固的大禮堂。所以，惟有這地基才是耐久的。別的建築都是暫時的，都是豫備在過渡時期中應用的。等到那值得與這偉大的地基相配合的大禮堂的計劃作成之後，便要把牠毀去的。故此，我們應當明白這地基建造的原則，因爲這才是甘地的思想的真正之表現。甘地每日從這深深的地基中吸取了勇氣和力量，以從事上部的工作。

甘地信仰他的人民的宗教——印度教。但是他不是一位學者，專拘泥於經文的解釋；也不是一位盲從者，毫無思慮地接納他的宗教的一切的傳說。他的宗教應當滿足他的理智。并和他的良心的旨意相符合。

「我不願使宗教爲一種偶像，也不願用牠的聖潔的名來寬饒罪惡。」（一九二〇年十

月二十七日。)

「我對於印度教的經典之信仰，並不是字字句句都要接納牠。不論何種解釋，無論牠是多麼深奧，假如牠是和理智或道德相違背，則我必定不願受牠的拘束。」（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他也不是把印度教當爲惟一的宗教。這是一點很重要的要點。「我不相信吠陀爲獨尊無外的經典。我相信聖經，回教的可蘭經，聖奧維斯他 (Zend-Avesta) (波斯國的古經) 都是和吠陀一般的受天所感而發出的福音。……印度教並不是特派的宗教。在牠裏面尙有很多地方可容對於世界上一切先知的崇拜。……印度教告訴我們各自以欽敬承認惟一的

上帝爲正法 (Dharma) 所以牠和其他一切的宗教都可得生命的平和。」^①

①「一切的宗教都像在很多不同的道路，通於同一的目標。」（見印度自主 Hind

Swaraj）「一切的宗教都是以相同的心靈上的法則爲基礎。我的倫理的宗教便是由

於這種種管束世界上全人類的法則所組成。」（見倫理的宗教。）

他看出錯誤和罪惡經過了很多年代緩緩地潛入宗教裏面，他把牠們都指出來，但是他又接着說：

「要明白我對於印度教的感覺，最好把我對於我的妻子的感覺來作一個比喻。在這世界上，實在是沒有一個婦人能像她那樣感動我。這並不是因為她沒有過失，我敢說她的過失比我知道我自己的還要多。但是那種「不可分離的團結」的感覺，仍是存在。可是雖然如此，我仍是覺出印度教的一切過失和限制。沒有一件事比着季達經中的樂詩，或是土拉斯達 (Tulasdas) 所作的羅摩衍那 (Ramayana) ——一種敘述維士努 (Vishna) 第七化身羅摩旃陀羅 (Ramachandra) 的冒險的故事——更能使我得意。印度教的經典，我曉得的，可說惟有這兩本書。我知道在今日在一切的大印度神座裏，尚有罪惡繼續向前進行；但是牠們雖然墜落，我仍是愛惜牠們。從頭到尾，我終是一個改良家。但是我的熱誠從未會使我排斥印度教中任何重要的事物。(一九二一年十月六日)

什麼是這甘地所信仰的重要的事物呢？在一篇於一九二一年十月六日所寫的文章中，甘

地說明他對於印度教的觀念。

1. 他說他相信吠陀、優婆尼沙曇 (Upanishads)、普蘭那 (Puranas) 和一切稱爲印度經典的書。故此，他相信聖靈之降臨和重生。

2. 他相信「種姓法之訓練」(Varnashrama Dharma) ①這樣的「相信」乃是一種「嚴格上的吠陀式」的意思，所謂「嚴格上的吠陀式」與現在所稱的「普通和大概的意思」未必相符。

① 依名詞的解釋 (Varna) 是「色」(colour) 「階級」(class) 「種姓」(caste) Ashrama 是訓練的地方，dharma 是「法」(原書釋爲 religion，作宗教解。) 換句話說，就是「社會是爲訓練種姓的。」

3. 他相信牛的保護。這「保護」二字的意思，較一般的意思更爲廣闊。

4. 他并不反對偶像之崇拜。

凡是讀甘地的「信經」讀到這裏便停止了。的西方人，無論是誰，都容易感覺到牠所啓示

的那一種「心的狀態」和我們的大不相同，而且這種「狀態」在時間上和空間上都離開得很遠，因為缺乏共同的尺度的緣故，斷不能和我們的理想作一個比較。但是假如他再讀下去，他將讀到下列幾行敘述一種比較和我們相熟識的辭句：

「我深信印度的俗語，這俗語說：凡是未嘗求達於完全的「無傷害」（即亞喜米沙）「真理」和「自制」並沒有捨棄一切的財產的，都不是真正明白沙斯脫拉斯（Shastras）的人。」

⊖沙斯脫拉斯為教訓印度教人的聖典，或解為吠陀經之釋文。

在這裏，印度教人的話便和福音中的話相連接了。甘地也知道他們的相同。在一九二〇年有一位英國的宣教師問他那本書對他的影響最大，甘地回答說：「新約。」（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在次行甘地即繼續說：「魯斯欽 Ruskin 和托爾斯泰。」）

甘地的倫理的宗教的最末一句話是從新約中摘錄出來的。⊖他說他的消極的抵抗主義，乃是在一八九三年讀完了耶穌登山寶訓之後才得到暗示。（見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的

印度青年）當那宣教師很駭異地問他：他真的從印度經典中沒有得到同樣的消息的時候，甘地回答說：他從他所敬重的巴格哇季達經（Bhagavad Gita）中尋得他的勇氣和指導而消極的不抵抗主義的祕訣，則是由於新約中明白的。他說：當他發見這樣的暗示的時候，也不禁心中大樂，而當他證實季達經也是有同樣的訓示時候，他更是樂不可支了。①甘地并說托爾斯泰的「天國在我們的內心」的理想，也使他將他自己的信仰變為一個實際的主義。②

①「你若是願意去找尋天國和真理，這些東西就可以為你所有了。」

②一九〇八年，甘地對杜克（J. J. Duke）說上帝在過去時代曾化身為種種不同的形狀，因為季達經中克立什那（Krishna）——維士努（Vishna）第八化身——說：「當宗教衰落而「不信仰」流行的時候，我必定要自己現身。為要保護一切的善，被壞一切的惡，和創立教義，我必定要永遠地降生，而再降生。」基督教是甘地的神道學中一部分。基督是上帝一回明亮的表現。但是他不是唯一的表現。在聖殿上坐的，不只是他自己一人。

③在印度自主（Hind Swaraj）一書中，甘地作一個托爾斯泰的作品的表，表中所列的大

概有六十種作品，都是他要介紹給他的信徒的。這六十種作品中，有以上幾種天國在你的內心，什麼是藝術和我們要做的是什麼？甘地告訴杜克君說托氏對他的影響很深，但是他竟不能和托氏的政治理想表示同意。在一九二一年有人問他對托氏的意見，甘地回答說：「我對他純是一個終身感受其賜的敬仰他的人。」（見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的印度青年）

我們應當不要忘記了這個亞洲的信仰家曾翻譯魯斯欽（Ruskin）和柏拉圖，摘錄托洛（Thoreau），羨慕馬志尼（Mazzini）和讀卡盆特愛德華（Edward Carpenter）簡單說一句，就是他是熟識英美的最特出的人的。

假如歐洲的人認真細讀甘地的作物，我敢說他斷然不至於不了解甘地的主義，和他對於歐西的偉人的了解。單就甘地的信經的字面上的解釋，實在會使他駭異，而假如他浮淺地讀過這兩段文章，也實在是要使他覺得甘地的心的狀態是和我們的相差太遠，似乎亞洲和歐洲的宗教理想中間，就有一面不可陵越的高牆樹起。這兩段文章，一是說及牛的保護，一是說及種姓

制度。關於甘地對於崇拜偶像的見解，并不用什麼特別的考究就可把牠說明。甘地說他對偶像並沒有敬意，但是他相信偶像之崇拜是人性中的一部分；由此，他已經很明瞭地把他的態度表明了。他把偶像之崇拜當爲人類脆弱的頭腦中所固有的特性，因爲我們都是象徵的追求者，故此都應當把我們的信仰物質化了，而後才能真真的了解牠。當甘地說他不反對崇拜偶像時，他的意思，也不過如我們之認許教堂裏面的禮節一般吧了。

甘地說「牛的保護」是印度教的中心事實。他把牠看作「人類演進中的最奇特的現象」。爲什麼呢？因爲他把牛當作全「次於人類的世界」之表記，牛的保護便是人和他的啞的兄弟訂立同盟契約的意思，牠表明人與獸是同胞的。照甘地的解釋，人類由於學習尊敬動物，已被提出他的「種」的界限，而實現和一切的生命同化爲一。

爲什麼在很多動物中，專選出牛來爲表記呢？這乃是因爲在印度，牛是最親近人類的，牠是富裕的施給者。牠不單是給人類以奶，而耕種又是非有牠不可。故此甘地在這溫和的動物之中，看出了一種憐恤的詩意。

但是甘地對於牛的崇拜，並沒有一種崇拜偶像的意思。有一般人只拘守崇拜牛的形式，而沒有一種對這「上帝的啞的物類」表示憐恤的精神。甘地對這一般人的責罵，可說是沒有一個人比他更爲利害的了。凡是明瞭甘地要人們對於他們的「啞的兄弟」表示一種憐恤和同胞的精神的人——誰能比 Povarello Assisi 更懂得這種道理呢？——必定不駭異爲什麼甘地在他的信經中那麼着重牛的保護。由於這點看起來，他說牛的保護是「婆羅門教給與世界的禮拜」的確是無錯的。聖經的箴言說「愛你之鄰，有如愛己。」甘地再添加一句說：「每一個生物，都是你的鄰。」^①

①關於牛的崇拜請參閱一九二〇年三月十六日，六月八日，二十九日，八月四日，及一九二一年五月十八日，十月六日的印度青年。關於種姓制度，請參閱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八日，一九二一年十月六日的印度青年。

甘地對於種姓制度的信仰，差不多是更難使一個歐洲人或西方人了解了——這好像是比那與一切生物爲兄弟的意思，更是聞所未聞。我或者應當說「今日之歐洲人或西方的思想」

更爲正確，因爲在今日我們還相信某種限度的平等，誰能知道將來又是怎樣呢？誰能知道經過了這一層有德模克拉西之名而無德模克拉西之實的演進之後，我們受了牠的效果的陶化，又要變成怎樣的呢？我並不幻想甘地的種姓觀念經我一翻解釋之後，便可受容納，而我也沒有這樣的欲望。但是我要說明甘地的種姓觀念，是和我們平常所謂「種姓」的意思不同，因爲他的種姓之分化，並不以社會高下等級之虛榮爲基礎，而是以責任爲基礎。

我想（他說的）遺傳的律是一種永遠的律，如果變更牠，則必至於紛亂……種姓制度（Varnashrama）是一種人性的遺傳。印度教不過是把牠變爲一種科學。

甘地相信四級的分制。第一種姓是婆羅門（Brahmans）即是智識和精神階級；第二種姓是利帝利（Kshatriyas），即是軍界政界階級；第三種姓是吠舍（Vaishyas）即是工商階級；第四種姓是首陀（Shudras）即是勞力階級。這樣的分級並沒有彼高此低的意思，不過是以職業劃分而已。「這樣的分級爲的是要限定責任，而不是要賜與特別的權利。」^①

「如果自己冀望一個優越的身分而派定他人一個卑下的身分，便是和印度教的精神

相違背。我等有生以來全受役於上帝之創造的，婆羅門用他的智識，刹帝利用他保衛的威力，吠奢用他商業的才能，而首陀則用他身體的氣力。

這并不是說一個婆羅門可以完全不用勞力，不過是說他的特出處是在智識，而由於天賦和修鍊的緣故，他適合於以智識教授他人吧了。假如一個首陀要求得任何智識，也不能阻止他；不過他所最能服務的是他的體力，故也不必羨慕他人能於服務的特才。倘如一個婆羅門說他因為有智識而站在較高的地位，則他已是墜落了，也不配說有智識了。種姓制度 (Varnashrama) 是自制和經濟與能力之保藏……」

○這是和優婆尼沙曇相吻合的，因為當原初階級因時代之演進變為高傲的貴族的時候，這印度的聖經即表示反對和不認許。

故此，甘地的種姓制度是以責任為基礎，而不是以權利為基礎的。並且，我們須要記住依着印度教的解釋，因為轉生的緣故，便可使種姓的利益互相平衡，因為在轉生的時候，一個婆羅門必變為一個首陀，而首陀則變為婆羅門。

這樣的種姓制度，乃是以資格相等而不同級的人爲其對象，對於印度教人對「不可接觸」Un-touchables 或帕利亞人 (Pariahs) 的態度，並沒有關係。我們在後邊要研究甘地爲帕利亞人所發出的動情的呼籲。他的運動，着眼於爲被壓迫階級謀利益，這是他的事業的最可動人處。甘地以帕利亞制度爲印度教的污點，使真的主義生出一種卑惡的病端。他刻不容緩地想把牠除去。

「我寧願粉骨碎屍而不願捨棄了我的被壓迫階級的弟兄……我不願再生於世，但是假如我必定要再生，則我來世願作一個「不可接觸」的帕利亞人，以分擔加於他們的悲痛、侮辱和危難，使我能竭力奮鬥，使他們脫離了不幸的苦海。」

因此，他進收納一個「不可接觸」的女子作他的義女，他用一種親愛的口調敘述這個七歲的小女在家中管理家務的狀況。

6.

甘地在他的印度教信條之下的心思和志氣，我已說得很多了。甘地是一位較爲溫和和可

愛的托爾斯泰，假如我敢斗膽說一句，他比托氏又更爲基督教化，因爲托氏之爲基督教徒，與其謂之爲稟其天性的，還不如說是由於他的意志的力量使然的。

在責備歐西的文化上，他倆是完全相同的，不過或者托氏的影響較大吧了。

自從盧騷的時候，我們的西方的文化已受那一般眼觀遠大的思想家所攻擊。當亞洲初度醒覺，知道自己的力量，而起來反抗歐西的侵略的時候，她只須在歐洲過去的史績裏尋覓，便可得到這稱爲有文化的侵略者的可驚人的罪惡之記載。甘地也知道這樣做，在他的印度自主一書中，他列了一個書表，裏面有很多由英國人所寫的責罵歐西文化的書。這種作品爲什麼沒有響應的呢？這乃是因爲歐洲自己正用種種騙人的主義的名，和那過去所稱爲「爲文化而戰爭」的大戰所揭曉的欺騙，貪污，和暴虐，以壓迫，劫奪，和吮其他的民族的血液的緣故。等到她發起狂來，自己深入了深淵，才甚而赤裸裸地請亞洲和非洲的人來審究她的毛病。他們看見她了，因而便審判她。

「這一次的大戰除了揭明那統治今日的歐洲的文化之一撒旦的本性」之外，并沒

有表明什麼。戰勝的，憑着道德的美名，把一切公衆道德的教規都破壞了。無論怎麼卑鄙的欺騙，也都說出來了。一切罪惡的動機，不是宗教的，也不是精神的，而很濃厚地含着物質的色彩。……歐洲今日不過是名義上的基督徒，實際上却是崇拜財神。」（一九二〇年九月八日。）

○這是一個甘地所常用的名詞。如「不可接觸」是撒旦所發明的。」（一九二一年六月十九日。）

在過去五年中，在日本和印度，你都可尋出和此相同的感覺重複地發表。凡是細心一點的領袖，不敢公開說出的，都在態度上表明他們私衷的信仰是這樣。這並不是一九一八年皮立克（Pyrrhic）希臘古代的一種軍舞——勝利的最少禍害的效果。

可是在一九一四年之前，甘地早已看穿了歐西文化的真面目了。當他在南非洲作二十年的運動的時候，歐洲文化已脫下了假面具給他看了。在一九〇八年，在他的印度自主一書中，他以「大的罪惡」稱呼現代的文明。

甘地說，文明只是在名義上的文明而已。實際上，牠和昔時的印度教所稱的黑暗時代正正

相合。牠已把物質上的安適視爲生命的惟一的目標。牠呪咀精神上的價值。牠使歐洲發狂，使牠只知崇拜金錢而阻止他們尋求和平或發展其固有的美質。西方的文明是弱者和勞動階級的地獄。牠吸吮了人類的原動力。但是這種「撒旦的文明」終必自己破壞自己。印度的真正的敵人是歐西的文明，英國人還不及牠，因爲就個人而論，他們並不惡，不過是受他們的文明所牽累吧了。甘地批評那一班欲驅逐英人出境，自己發展印度，并依着歐西的標準來振興自己的文化的愛國者他說，這有如去虎而留虎之本性。印度的目標應爲打倒歐西的文明。

在他審究歐西的文明中，甘地特別地責罵下列三種人物：文官，醫生，和教員。

甘地之反對教員，是很易可以明瞭的，因爲他們使印度人呪咀和藐視自己的語言，拋棄自己的真的意志，實際上可說他們對着他們所管轄的學生加以一種對於國家的侮辱。除了此點之外，歐西的教員只曉得栽培智育，而忽略了心和品格之訓練。最終，他們又減損了身體的勞働力，并在這個人口百分之八十是農民，百分之十是工人的國家傳播純粹的文藝的教育，這確然是有罪的。

文官的職業是不正當的。印度的官署都是不列顛統治的武器，一般說來，牠們都是在印度人中間鼓動風波，增進彼此軋轢的仇恨。牠們是爲那最壞的本能的利己之侵略當囉卒。

關於醫業一層，甘地承認他起初是爲牠所引動，但是不久他便覺出牠也是不正經的了。這一個緣故，爲的是西方的醫學只知治療經已患了病的，而并無設法除絕疾病的淵源——這幾乎一律都是罪惡。實際上，我們差不多可說西方的醫學反而促進了罪惡之發生，因爲牠減除了許多危險，使人們可以隨便滿足自己的性欲和食欲。故此，牠的貢獻，無非是在於敗壞人民的品格，而由於不使他們依着靈魂和身體的例規，強健他們的性格，反而用一黑暗的神祕的藥方，使他們可以醫治自己，而銷磨了他們的意志力。爲反對這種西方的假醫學——甘地對於牠的批評，常時有點過火——他創立了一種豫防的醫學。他寫了一本小冊子，名爲健康之路徑，這是他積了二十年經驗的果實。牠是一篇醫學的論文，而同時也是一篇道德的論文，因爲依甘地的見解，「疾病是我們的行爲的結果，而同時也是我們的思想的結果」他以爲要創立一定的幾條法則來防止疾病是一件比較簡單的事，因爲一切的疾病都是同源的，比喻說，都是由於忽略

了健康的自然律的。身體是上帝的宮殿。我們應當使牠潔淨。甘地的見解，固然是有真的地方，但是「治療」的效力，也已經是真正地證明爲有用的了，而他則有點過於固執地不肯承認牠。他的道德上的觀念也是極端嚴格的。e

○我們應當記住他反對西方醫學的主要的理由中有一條是反對牠的活體的解剖。他稱這種解剖爲「人類最黑暗的罪惡。」

○特別是對於性的關係。在嚴厲上，甘地的主義是同於聖保羅的。

7

但是現代文明的原子——或是比喻的說，牠的心——是機器。這是一個鋼鐵的時代！一個鋼鐵的心！機器已經成爲一種驚人的偶像。我們應當把牠除去。甘地的最熱烈的盼望便是要看在印度沒有機器之存在。在爲不列顛機器的繼承者之自由印度，甘地寧願她依賴着英國的市場。他寧願印度去買入從曼徹斯特 (Manchester) 所製出的原料，而不願在印度創設如曼徹斯特一般的工廠。一個印度的煤油大王（洛克斐勒）也終不過如一個歐洲的資本家。機器是一

種奴隸人國的大的罪惡，而貨幣則是一種毒物，也是一種性的罪惡。

可是印度的新進派都受現代思想所陶染，不免要問假如沒有鐵路、電車、或工業，印度究竟要變成什麼樣子呢？甘地回答說：那麼在這些東西尚未發明之前，印度并不生存麼？在過去數千年中，印度嘗經單獨不搖地反抗幾度帝國之變遷。其他一切的事情都已過去了。但是在數千年之前，印度便已學得了自制的本事和求得快樂的學術。她已經不須學自他國了。她并不需要大城市的機器。她的昔時的榮華是創立於犁耙和織機及一種印度哲理的知識之上。印度應當回歸她的昔時的文化之源泉。不過這當然是不可倏忽而至，而是要漸漸地歸回去的。故此，我們各人都應來幫忙這種演進。（見印度自主。）

這便是甘地的基本論點。這是一個極主要的論點，因為在實際上牠是否認歐洲科學的功績之進步，而不容我們不討論的。⊖這種中世紀的觀念，自然容易碰上了人類智識的如火山爆發一般的前進，而冒着被化爲火灰的危險。但是，在未討論什麼之先，我們或者是應當把「人類智識……的前進」這幾個字換爲「某種人類智識……的前進」方爲恰當，因為假如一個人

相信——如我所相信的——宇宙的精神是一個和協的整體，他也應當知道這個整體是由於很多不同的聲音所造成的，這些聲音，都是各自唱牠自己應唱的曲調。我們的幼稚的西方，爲了牠自己的籌算所蒙蔽，而不能充分地看出（一）牠並沒有常常引導着這條歌調；（二）牠自己的進步的法則也一樣受着虧蝕，退步和重起的限制；（三）人類文明的歷史是好些種人的文明的歷史；（四）當在一種文明統治其他文明的時候，雖然有一種畸形的，混沌的，破碎的，和有的時候完全停止的進步可以隱約看得出來，但是假如我們說一種偉大的文明統治種文明便當然是全人類的進步，那便是錯了。

○雖然甘地不贊成歐洲的科學，他却看出一科學的功績「之必要處。他佩服歐洲科學家無私心的熱情和犧牲自己的精神，而常常說他們的自制力較印度教徒爲偉大。但是雖然他這樣欽仰他們心的狀態，他却不贊同於他們所追求的目標。在甘地和歐洲的科學中間，顯然有一種敵對的觀念存在。關於這一點，在後邊，我們就將看見太戈兒怎樣表示他反對甘地的中世紀觀念。

但是我們不須對歐西的進步的定義加以討論，而只是記住了這定義是和甘地的信仰相衝突的，則我們應知道沒有一種衝突會銷磨了他的信仰的。如果「相信其他的事」便是表明不曉得東方人的心的作用了。如哥比尼（Gobineau）所說的：「在做一切的事上，亞洲人人是比我們更爲固執的。假如必須的話，他們便敢等了好幾個世紀的時光來完成他們的理想，并當在這理想經過這麼長久的時期而達於成功的時候，牠并不像是老弱不堪，或是已經失落了任何生氣。」「好幾個世紀」在印度人看起來并不算什麼。甘地是豫備在一年之內得到他的工作的勝利；但是他也豫備在幾個世紀之內得到同樣的勝利。他并不強迫「時間」。假如「時間」只許緩緩地做成，他也依着一「時間」的前進調節他的步趨。

故此，在他的運動的過程中，假如甘地覺得印度還沒有充分地豫備來了解和實行他所要施行的急進的改造，則他必以他的主義來適應於一切的環境。他要等候他的時候。因爲這個緣故我們聽他在一九二一年宣告下列的話時也就不驚愕了：

機器消滅了我并不悲痛，而也不把他當爲一種禍災。但是現在我對於機器尚沒有這樣

的計劃。(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九日)

或：

完全的愛的法則是我的生存的法則。但是我并不是由於我所倡議的政治的方法來宣傳這條最終的法則。我知道任何這樣的嘗試終是要失敗的。如果要盼望一大羣男人和女人立刻便服從這條法則，那便是不明瞭牠的作用了。(一九二〇年三月九日)我并不是一個空想者。我自己以為我是一個實際的理想家。(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一日)

甘地從未嘗令人做他們所不能做到的事。他總是令他們做他們所能做的。可是像印度這樣的一個國家，她能做的範圍便包括甚廣了——一個可驚人的國家，在她的多數的權力，她的持久的氣魄和她的深沉的靈魂上，都是可驚人的。從最初的時候，甘地和印度便已訂了一個協約，并不用什麼語言來表白，他們彼此便已互相明了。甘地知道印度所能做的，而印度也豫備做一切甘地所要吩咐的。

在甘地和印度中間，其首要的連結便是絕對同意於下列的目標 *Swaraj*，國家的自主。①

①辭意：Swa 是「我」，raj 是政府，即是自主。這個字很古在吠陀經中已經有了，但是甘地的「巴爾西」(Parsee) 先生達達海 (Dada bhai) 引用他，並使他成為政治上的術語。他說：「我知道自主是國家的目的，而「不暴動」則否。」

他接連着說：「我寧願見印度由於武力以獲得自由，而不願見她受縛得如像做她的外國的侵略者之奴隸一樣。」這些話在他的唇裏說出來，是很可駭異的。

但是他立刻便改正他自己說：這是一種不可能的比喻，因為武力永遠不能使印度自由。自主惟有由於靈的力量才可得到。這是印度的真武器，是愛和真理的不可屈服的武器。甘地用「沙特雅格拉哈」(Satygraha) 這個字來表達牠，「沙特雅格拉哈」的定義，他定為真理和愛的力量。②當甘地宜講這種福音而揭曉愛與真理的本性及牠們的隱藏着的力量給他的人民知道的時候，他的天才便自己表現出來。

③辭意：「沙特雅」是公平，「格拉哈」是嘗試，或奮力，合稱起來便是「一種公平的奮力」，其意即在於不接納和反對「不公平。」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五日甘地肯定其義為：

「擁護真理，故也即是真理的力量。」他接着又說：「我也嘗定其義爲愛的力或是靈的力。」

在南非洲，甘地用「沙特雅格拉哈」來說明他的理想與消極的抵抗主義之差異。我們應當對這兩種運動的差異加以特別的注意，因爲沒有一種事比着稱甘地的運動爲消極的抵抗運動更爲虛僞的了。我們可說這個不倦的戰士，這個「反抗者」的「一個最轟烈的現身的人」對於消極主義之恐怖，比着任何人都大。他的運動的靈是「動的反抗」——這「反抗」所表現出來的途徑，不是由於武力，而是由於愛，信仰，和犧牲的動的力量。這種由於三種力合成的力量，便是表達於「沙特雅格拉哈」這個字。

凡是怯弱的，請不要在甘地的旗幟之下隱藏他的怯懦！甘地要把他逐出於社會之外。寧可用武力而不可畏怯！

若在惟一的選擇是在「懦怯」與「暴力」的之間的地方，則我必勸人選擇「暴力」……（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一日）我栽培那不殺人而就死的靜默的勇氣，但是假如一個人

沒有這種勇氣，則我必勸他殺人和被人所殺而不可羞恥地從危險中逃開來，因為如果他走開，他便是犯了「心靈上的暴力」的罪，他走開乃是因為當他殺人的時候他沒有不怕被人所殺的勇氣。（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日。）

我寧願冒千方暴力的危險而不願使一種族萎靡困頓。我願印度用武力來保衛她的光榮，而不願她畏怯地爲她自己的侮辱的一無所賴的受害者。⊖

⊕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一日。甘地所創立的阿斯蘭學院（Ashram）規則中有一條是「無畏」。「精神」應當不畏帝王，國家，宗族，家庭，人，野獸，和死。這也是因陀羅（Hindu）中的不暴動反抗的第四條件。其他條件是「貞潔」、「貧窮」和「真理」。

但是我相信「不暴動」是無限量地優於「暴力」。「寬恕」是較文明於「責罰」。「寬恕」可以鼓進一個兵士。惟是在於有責罰的權力的時候，「不責罰」才是一種「寬恕」。如果是一無所能的而假冒着寬大，那便是無意義了……我不相信印度是一無所能的。三百兆人民並不須恐懼十萬英國人的。

并且

力量并不是從「肉體上的才力」生出來而是從一個「不可屈服的意志」生出來。「不暴動」并不是說柔弱地屈服於作惡者的意志之下，而是竭盡個人的全心靈上的力量去反對那暴君的旨意。若在這條我們的生存的法則下工作，則一個人便可反對一個不公正的帝國的威力和創立等那帝國傾倒後所要設立的地基，或說是創立牠的繼承者。

但這要有什麼代價呢？牠的代價便是受苦——這是一條偉大的法則。

受苦乃是人類所以爲人類的界線。牠是一種永遠的法則。（一九二〇年六月十六日）。做母親的應當受苦，而後她的兒子才能生出。生命是從「死」來的。麥的生長的條件是種子應當入地滅。沒有一個國家之興起沒有經過苦楚的火的陶鍊的……我們不能消滅這條受苦的法則，牠是我們生存的一種免不了的條件。進步是應以所經受的痛苦之量來測量……這痛苦愈純潔，則進步也愈偉大。（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一日）

不暴動在牠動的狀態中是「自知的苦楚」的意思。……我嘗經冒險把昔時的犧牲的法則——受苦的法則——奉獻於印度之前。那在暴動進行當中而發明了不暴動的法則的理希斯人（Relig）的智慧和氣力，是較之奈端和威林敦更爲偉大。他們自己已經明白了兵器之功用，而能覺出牠們的不可用處，并教這個困倦的世界說：得救并不由於武力，而是由於不暴動。……不暴動的宗教并不是單爲理希斯人和聖者。牠是給與一般的民衆的。不暴動是我們人類的法則，正如暴動是禽獸的法則一般。人的尊嚴要求我們服從一種較高的法則，——服從精神的力量。……我要印度自己覺出自己的力量和威權來實行不暴動。我要印度認出她有一種不能消滅的魂魄，這種魂魄能升於一切肉體的軟弱之上，并能反抗全世界的肉體的團結。（一九二一年四月六日。）

高尚的虛榮——他對印度的高傲的愛——要求印度責罵暴力爲無足貴的，而豫備去犧牲她自己。「不暴動」便是她的尊號。假如她拋棄了牠，她必要墜落。甘地忍不了這種思想。

假如印度以暴動爲她的信條，則我必不願居住印度。她將不能激起我任何尊榮。我的愛

國心是遵着我的宗教。我緊抱住印度有如赤子之抱住母懷，乃是因為我覺得她能給我以我所需要的精神上的滋養。假如她不能這樣做，我便覺得我如一個孤兒，永遠地不能望得一個監護人了。那麼，喜馬拉雅山的雪堆便要給我的流着血的靈魂以牠們所能賜給的安息……

e

⊖ 在甘地入獄幾個月前，他答復那說他的行動為不合羅輯的批評。批評他的人譏笑他在南非洲和在歐戰中所給與英國政府的幫助。甘地的答語并未試避開這個辨難。他說他忠誠地相信他是帝國中一個國民，而審判政府也不是他的事。他以為人人以為自己有權利可以批評政府是錯的。他信托英國的智慧，并在可能的時間內盡忠於牠。政府的反常的舉動已打破了他對牠的信仰。讓政府去負擔牠的報應吧！（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8.

但是甘地并不疑惑印度的忍耐。在一九一九年的二月，他決定發起「沙特雅格拉哈」的

運動，這種運動的成效，已在一九一八年的田地革命試驗出來了。

這運動并不全是政治的，因為甘地到這時還是一個忠於政府者。當他胸中對於英國的忠誠尚有一毫信仰的時，他仍是不放棄這種態度。直至一九二〇年的正月，他還提倡與帝國合作，雖然在那時的國家主義者很劇烈地批評他。（一九二一四月六日）甘地的論辭都是由於他的誠實的信仰所感發，在他反抗政府的運動的第一年，他能誠實地對罕特伯爵（Lord Hunter）表白他相信「沙特雅格拉哈」的信徒是最忠於憲法的。都是由於政府的胸懷不闊達的固執，印度的心靈上的導者才被迫而至於撕毀他所認為自己應受其拘束的盡忠的契約。

故此，就原初說來，「沙特雅格拉哈」的運動是一種依循着憲法而對於政府的反抗。牠是一種可尊敬的為一定迫切的改良的要求。政府不該通過一條不公平的法律。「沙特雅格拉哈」的信徒是安分守法的人民，但是他們因為這條法律不公正，所以便立意不服從牠。假如他們的態度不能使政府相信撤回這條法律是必須的，則他們必擴張其範圍而至於不服從其他的法律，因而至於停止和政府合作。但是這樣可以表明印度給與「沙特雅格拉哈」這字的意義和

我門在西方給牠的意義是如何不同呵！牠竟含有這樣出常的宗教的英雄主義呵

沙特雅格拉哈的信徒因爲不准用武力來進行他們的工作，（其意是說敵人也是誠摯的，因爲一件事由這方看起來以爲是真的，由他人看起來也許是不真的，而武力則不能感服他人的信仰。）[⊖]故此他們必須單獨依賴着由他們的信仰所放射出來的愛的力量，和他們的甘願自由地和快樂地接受苦楚和犧牲的意志。[⊖]由這兩件事，便組成了一種不可抗拒的宣傳；憑着這種宣傳，基督的十字架和他的幾個門徒便能把羅馬帝國征服。

⊖反之，暴力適足以降低那使用他的人的品格。在戰爭開始時，同盟國歸罪德國的行爲，但是她們的暴力使她們也像德國了。（一九二〇年六月九日。）

⊖最堅硬的纖維也要受愛的火所融化；如果牠不融化，便是因爲那火力尚不足強度。（一九二〇年三月九日。）凡加入沙特雅格拉哈運動的人，必須應許（一）不服從那沙特的雅格拉哈委員會所宣告爲不公平的法律；（二）依循真理的途徑；并（三）對於敵人的生命身體財產不施用暴力。

爲因要特別着重於「人民情願爲公理與自由的永久之理想而犧牲自己的決心」之宗教性質起見，甘地特將一九一九年四月六日，定爲禁食祈禱之日，并使全印度實行「哈爾多爾」(hartal) ①以爲其運動之開始。這便是第一種步驟。

①「哈爾多爾」是印文「停工」之音，原字係發原於回文。

這第一種步驟直接打入人民的心，而鼓起了他們的最內層的知覺。這是第一次全印度一切階級聯合於同一的理想之下。印度已經把她自己建立了。

各地方都依循着秩序。在德利 (Delhi) 不過有幾處騷擾，②而甘地竟親自出來鎮靜牠。但是政府却把他囚禁了，并押他回歸孟買。他被囚的消息傳到般遮布 (Punjab) 便激起了暴動。在阿木里昔爾 (Amritsar) 地方有幾間房屋被劫掠，也有幾人遭受殺戮。在四月十一號的夜裏，台愛 Dyer 將軍帶他的軍隊臨這個城，而把牠佔據了。這時各處還是很平靜。四月十五號是印度一個大節日，有一個民衆大會將在查里安哇拉巴格 (Jallianwalla Bagh) 地方執行。聚會的民衆極爲和平，而也含有很多婦人和孩子。在這天之前的夜間，台愛將軍發出了一方禁止民

衆集會的命令，但是沒有人曉得這件事。可是在隔天，那將軍便帶了他的機關鎗到查里安哇拉巴格來，當場并不先與警告，而直接對着手無寸鐵的民衆開鎗鎗開了十分鐘，等子彈打完了才停止。因爲這地方的四週都是圍着高牆，沒有一個人能够逃避。結果打死的約自五百人至六百人，而受傷的更不勝其算。死的，傷的，過後都無人敢來照顧。在屠殺的結局，便立刻宣布戒嚴，般遮布地方驟充滿了恐怖的空氣。飛機對着無武裝的民衆拋擲炸彈，那最體面的國民也被曳到法庭，嚴受酷刑，被迫而屈膝匍匐，和受其他種種不可言狀的侮辱。這好像是一陣狂風掃過英國的統治者；這好像是印度所宣告的不暴動的法則竟激起了歐西的暴動的熱狂。甘地看見流血受苦便在前面。但是他沒有應許他的人民說他將導他們由一條平安的路徑以達到勝利。他已先警告他們說這途徑應受血的洗濯。查里安哇拉巴格不過是開始的第一遭：

我們應當豫備鎮靜地遭逢了好幾千無辜的男人和女人的屠殺，而不只是一千半千之數，而後我們才能在這世界上得到一個非他國所能及的身分……故此，我們盼望凡一切有關係的人都不灰心，而擔起這個患難，把縊殺看作是生命的一回平常的事。（一九二〇年四

月七日。

因爲軍隊的稽查嚴密的緣故，般遮布 (Punjab) 慘案的消息直等至幾個月後尚未傳出來。但是當牠最終傳播出來的時候，一種奮怒的波濤驟然在全印度湧起，就是英國人的輿論也不免表示驚愕。政府便命令組織一個調查委員會，罕特伯爵 (Lord Hunter) 爲這會中的主席。

在這時候，印度國民大會也組織了一個副委員會，與政府的委員會分頭調查。如一般聰明的英國人所覺出的，政府適當的政策是應當責罰那在阿木里昔爾 (Amritsar) 屠殺的當事人。但是甘地并不要求到這麼多。在他的溫和的要求之中，他并不要求責罰台愛 (Dyer) 將軍和那些肇事的首官，雖然他責備他們，但並沒有仇恨和報復的意思。一個人對於一個癡狂的人所做的事，當然沒有什麼恨意。但是他應當使他再也不能做惡。故此，甘地只求政府撤回台愛將軍。但是事情并不是這樣……在調查的結果未公布以前，政府已通過一篇科罰條例以保護牠所僱用的長官。台愛雖然被撤去他的軍職，但他仍收到很多由私人所捐贈的酬金。

當印度正因般遮布的慘案沸騰未止的時候，在政府與人民之間，又發生了第二次的衝突，

這一回的衝突比着上次更爲利害，因爲牠發生的主因是政府負了牠自己的莊嚴的應許。政府的態度把印度對於「英國統治者的誠實」之信託，毀的一絲不存，因而使激起了重大的革命。

歐洲的大戰使在印度的回民發生了一回很難改決的疑難。在這一方面他們是英帝國國民，有盡忠於本國的義務；而在他方面則他們的教主是土耳其國皇，他們有服從教令的天責。他們決定如果英國答應不攻擊土耳其的主權，則他們當幫助英國。在印度的回回人以爲土耳其人當仍居住在歐洲的土耳其國上，而土耳其國皇所統轄之地，不單是伊斯蘭（Islam）的聖地，而是如回教中的士人所劃定的，伸而及於亞拉伯全境，包含美索不達米，敘利亞，和巴力斯坦的包圍地。這種意思，路易喬治（Lloyd George）和印度總督都已莊嚴地應許過了。可是，當戰事終結的時候，一切的誓言都已忘記。故當將加於土耳其的和約在一九一九年開始傳播出來的時候，在印度的回教徒便開始騷動。他們的不滿意終局乃發爲哈利發（Khilafat）（回教主名稱）運動。

這運動在一九一九年的十月十七日發起，當日便有一方森嚴的和平的示威運動發生。在

一個月之後（十一月二十四日）接着便是全印度哈利發大會在德里（Delhi）地方開會。甘地爲這大會的主席。用他敏利的眼光，他知道這回的回教人的騷動正可利用來使印度統一。要把印度的不同的民族聯合起來，是一個最爲困難的問題。英國人因爲回印的軋轢而常常坐收漁利，甘地又進而說他們反從中挑撥。可是無論如何他們終是從未設法使這兩個彼此如小孩一般地互相挑戰的民族能互相諒解。比喻說，爲要激怒回教人起見，印度教人專在經過清真寺時唱歌，明知他們在這地方是應守靜默的；而回教人也自不甘落後譏誚印度教人拜牛。這兩個民族不但彼此永遠不相往來，不相嫁娶，不與共食，而在兩者中間却永遠有一方惡意和仇視。英國政府便在這個絕對相信他們不能聯合一致採用同一政策的枕上，高睡無憂。故此，當甘地宣告印回的目標是一致的时候，英國政府就不免猝然驚覺了。在發表其闊達的見解中，——這更完善的政治手腕偶然相符——甘地催促印度人盡他們的力量幫助回教徒做成他們的要

印度教人帕爾西人（Parsees）基督教徒或猶太人假如我們願意有一個國家，則任何個

人的利益卽是全體的利益。故此，惟一所應考慮的，便是某一件事是否合於正理。

在阿木里昔爾 (Amritsar) 的大屠殺中，回教人的血已經和印度教人的血混合了。現在這兩個民族便應當宣誓聯盟——無條件的聯盟。在印度中，清真教人是最先進和最勇敢的份子。他們在哈利發會議中最先宣告如果政府不採納他們的要求，則他們必拒絕與政府合作。甘地贊同這種議案，但是依着他恐懼入於極端的天性，他不贊成在這時候提倡抵制英貨，因為他以爲抵制是一種薄弱或渴望報復的表示。在一九一九年的十二月尾，回教人又在阿木里昔爾 (Amritsar) 召集第二次的哈利發會議，表決派代表赴歐洲向英國政府和最高理事會報告印度的態度。同時，這會議又表決向印度總督呈遞一方哀的美敦書，警告他如果解決的條件不完滿，則必有事故發生。最終，在一九二〇年二月，又在孟買開第三次的哈利發會議，發表一篇宣言，裏面對於大不列顛的政策加以劇烈的批擊那一部分，便是這未來的颶風之先兆。

甘地知道這颶風正在醞釀，他不但不設法使牠實現，而反竭盡牠的力量，來消除牠的暴力。起初好像英國也知道這種危險由於故意耽延的退讓，她好像是正在盡力設法避免她以

前所取的態度的報應。國會通過一篇以蒙塔鳩 (Montagu) 和查姆斯福特 (Chelmsford) 的報告爲基礎的印度改良條例，這對於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影響，比較着人民的要求，更爲有力。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英皇發出了一篇聖諭，贊許這種條例，請人民和職官都盡力和政府分作，并催促印度總督赦免政治犯并請他實行一回大赦。甘地對於敵人的誠實，常有信仰，所以便把這種事件，解爲是英國將以較爲公正的態度對待印度的默示，所以他請人民一體歡迎這種改良。他承認這種改良是不完滿的，但是他說接受牠們可以爲達到更大的勝利的發端。他催促人民會議無條件地接納牠。在經過了一方劇烈的辯論之後，印度國民大會才表決採納他的見解。

但是不久便證明甘地的盼望都是一種幻想。印度總督并不聽國皇的詔諭，不但不釋放獄犯，而監獄之門却專爲執行死刑而開。這顯然是證明政府所答應的改良只是一方空話了。

在這極端緊張的時候，却又傳到一九二〇年五月十四所訂定將加於土耳其的和約。印度總督發出了這方消息，承認牠將使人民失望，并說如果是一定不可參加的話，則回回人可辭去

他的職務。

接着便是官方發出了阿木里昔爾 (Amritsar) 的屠殺的報告。這便是最末一回事了。

印度的國家知覺已受激發而湧起。一切和政府的連結都破裂。

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哈利發會議在孟買地方集合，通過接納甘地的不合作政策。這表決案在一九二〇年六月三十日的阿拉哈巴 (Allahabad) 的回回人大會中受一致表決而追認之。

在這時候，甘地寫一封公開的信給印度總督，告訴他不合作運動將開始進行，他說明他爲什麼採用這種方法，他的理論，是很值得研究的，因爲牠們可以證明到這時候甘地尚有避免和政府破裂的意思。在他的心中，他仍盼望可以由於適合法律的方法來使政府改良牠的策略：

唯一的途徑在我之前的，便是奮不顧身地與英國的統治者斷絕一切的關係，或是，假如我對英國的憲法的優越之本性尚有信仰的話，則設法糾正已往的錯誤，而恢復我的信任。我對英國憲法的優越性，可說是尚未失落了信仰；所以便是因爲我相信牠的緣故，我才勸我的

回回朋友撤回牠們對於閣下的政府的幫助，并勸印度人也和他們合作。

因此，這位帝國的高貴的國民，便藐棄了帝國的「盲目的榮耀。」

譯者註——本章所稱與回教徒對等之印度人，即係相信印度教的印人之意。

第二編

1.

在一九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甘地宣告他將在八月一日公布不合作（non-co-operation）運動，並將這日之前一日，定為禁食禱告的日子，以為這種運動的準備。他所怕的，並不是政府的暴怒，而是人民的熱憤，所以他傾盡心力，以求印度人民當中的秩序和紀律之維持。他宣告

有效的不合作運動是完全依賴於完密的組織。紛亂是由憤怒而生的，所以我們不應當暴動。就我們的情形而論，如果暴動，便是開倒車，并無謂地犧牲了無辜的生命。因此，駕於一切之上的，還是秩序之維持。

關於不合作運動的策略，甘地和不合作委員會遠在兩月之前已定有下列的幾種方法：

1. 辭去一切勳位和譽職；

2. 不參與政府公債的募集。

3. 律師停止任務，一切的訟爭皆以私方的仲裁方法解決；
4. 公立學校的學生，和他們的父母，須一致對於這種學校，予以抵制；
5. 抵制官方的改良會議；
6. 不參與政府的黨派，和其他公務的機關；
7. 拒絕接任一切文武官職；
8. 同意於沙德希 (swadeshi) 主義之宣傳。

按辭意，*swa* [沙] 謂「自」；*deshi* [德希] 謂「國家」；二字聯用，即「國家獨立」之意。但是不合作運動者却常常對牠加上了一種狹義的解釋，因而只含有「經濟獨立」之意。關於甘地的信徒由這兩字的觀念所生出的社會的福音，我們以後再說。

換句話說，這種程序的相對部分，便應當以一種能夠對於將來的新印度之建樹，有所促進的建設的方法來完成牠。

這種程序，規定了他們在第一步階所應做的事。我們在這裏，應當敬仰他的審慎的智慧，因

爲他用和平的方法，挽回了印度革命的怒潮，這種方法是歐洲的革命者從來所不用的，而也不免就此爲所驚愕。他並不是圖謀目前實行「文的反抗」；他知道「文的反抗」的意義。牠的意義，他早就在多羅（Thoreau）那邊認識了，而在他的文章裏面，也嘗引用過多羅的話。關於「文的反抗」和不合作運動的區別，他很費心地把牠解明。他說，純粹的不服從法律，並不算是「文的反抗」。「文的反抗」是圖謀反抗法律，破壞法律，惟有精選訓練的人才能做到，而不合作運動則只是一種民衆運動而已。他的意思是要準備印度的羣衆，起來反抗法律，但是他們必要漸次經過訓練，才可做到。他個道在目前，羣衆還沒有訓練成熟，所以在對他們的自信力尙未有確信之先，他不願輕易放縱他們出來反抗法律。因此，他便提倡不合作運動，不合作運動的第一步工作，並不嘗包含抗稅運動。甘地是等候着他的時機之臨到。

在一九二〇年的八月一號，甘地用他辭去勳爵的信，作爲發起不合作運動的信號。這封榮譽的信，乃是寄給印度總督的。

我把下列的三種勳章歸還給你（一）王頭金章（Kaisar-i-Hind gold medal）係前

任總督因我在南非洲所做的慈善工作而賜給我的；(二)蘇魯戰章 (Zulu war medal) 因我在一九〇六年爲印度義勇救傷隊的官職而賜與的；(三)波爾戰章 (Boer war medal) 因我在一八九九至一九〇〇年波爾戰爭中爲印度義勇護傷隊的副監督而賜與的。我這樣做，心中并不是毫無苦衷的。

但是在回述那在般遮布 (Punjab) 地方所發生的慘案，和哈利發運動發生的起因之後，他又接着說：

我對於這個一錯再錯，以袒護牠的罪惡的政府，斷不能再有什麼尊敬和愛護……政府一定要有悔過的日子。

故此，我便起來提倡不合作運動，這運動可以使那一般願意與政府斷絕關係的，能够實行；而倘如沒有暴動發生，則牠將必使政府收回牠的成命并痛悔牠的錯誤。

末了，甘地再添上了幾句「盼望總督能執其正道」的說，并說他要召集那幾位民衆所認爲領袖的人，來開一個會議，共同商量。

甘地的動作立刻便有影響。很多文官都跟着他辭了職位，學生也離了學校，官府和學校都變爲空所。全印度國會 (All India Congress) 於九月在加爾各答 (Calcutta) 開特別會議，以大多數的票決，贊許甘地的主張。甘地和他的友人毛拉拿沙科特阿里 (Maulana Shankar Aji) 同遊全國，在各處都受極熱烈的歡迎。

在甘地的一生中，最可表出他的領袖的本領的，莫如在他作事的第一年。在這一年中，全國暴動的空氣已醞釀成熟，只要微受煽動，立刻便可爆發。他應當把牠擋住并挽轉。甘地懼怕和厭惡羣衆的暴動，比厭懼什麼別的東西還要利害。他以爲羣衆的統治 (mobocracy) 是印度最大的危機。他仇恨戰爭，但是他寧願有戰爭而不願有狂慢的羣衆的暴動。他說：假如印度必須用武力來奪得她的自由，那麼，我們就用有秩序的武力即是戰爭來奪得，而不用羣衆的革命。甘地對於一切的示威和羣衆大會，都表示厭惡的態度，就是爲慶祝一些可歡慶的事情而開的，也莫不如此。因爲在一個充滿了喧呼和紛亂的羣衆中，極劇烈的暴動可以因無理的事情而爆發。故此，他再三主張保守嚴厲的紀律是必要的。他說：「從混沌的狀態中；我們必須尋出秩序來；我們

要引用公民的法律 (people's law) 以代替羣衆的法律 (mob law)。] 這個眼光明確的
神奇的人，他具有完善的實際的意識，這種意識是和那創立宗教式的制度以管束人們的靈魂
的歐洲偉大的人物相齊等的。憑着他這種意識，他授給我們以引導羣衆大會和羣衆運動的怒
潮的詳確的規律。

他說：「一種大阻礙，便是我們不注重音樂。音樂便是節拍，便是秩序，很不幸的，在本國中，音
樂是少數人的專利物，而從未曾普遍於全國。……我要使大家正確地合唱國歌變成爲強制的，
要這樣，我必要使一班大音樂家去赴羣衆的會議，教大家唱羣衆的樂。這是一件最容易的事，因
爲他們的腦根都是很簡單的。」

甘地還有其他的建議，他說在組織大的民衆運動的時候，應該不讓未受訓練而自動加入
的人參加。做首領的，應當是一個最老練的人。自動參加的人，應當各懷一本普通紀律綱要。他們
應當分散於羣衆之中，并習傳播命令的種種旗語和笛聲。全國的信號應當規定，并在一定的時
間內舉行。羣衆應不准入火車站，并在大路上，爲路人和車馬留路，和不應當攜帶孩童到羣衆裏

頭等等。

換句話說，在他所領導的浩汗的羣衆中，甘地使他自己成爲一個奏樂的領袖（一九二〇年九月八日，二十四日，并十月二十日。）

2

但是當在這個羣情奮怒，只要稍受鼓動，便可無意識地盲然暴動的時候，卻有一派政治領袖，執議暴動。在印度有很多高尚的人，相信印度的獨立，惟有由於暴動纔可奪得。這一派人不明瞭甘地的主義，也不相信牠在政治上的效力。他們要求暴動，要求直接的行動。甘地收到了很多同樣的信，促他停止主張不暴動，更糟的，還有一般含着譏笑的意思，說他的不暴動主義是一種假面具，并且說時候已經到了，這假面具應該丟在一邊，而發出戰爭的暗號。甘地含憤地回答，并含憤地討論所有的辯詞。（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一日及二十五日。）在連續的幾篇美麗的文章中，他責罵用劍的主義。他否認印度的經典和哥蘭經（Koran）有贊許暴動的話。在任何宗教的教義裏面，都沒有暴動的成分。耶穌是不抵抗主義的王子，季達經（Bhagavad Gita）裏面並沒有

講說暴動，而是說我們應當完成我們的責任，就是連生命都犧牲了也值得。（最少是甘地把牠這樣解釋。可是歐洲的人有誰敢說季達經裏面明白地表明牠對於干犯暴動或容忍暴動的，都持膜不相關的態度呢？）因爲人並沒有創造的權柄，所以他就連那生存着的最小的動物，也沒有權利去毀傷牠。所以一個人對於任何人，都不應當仇恨，就是他是一個作惡的人，也是如此。但是這并不是教我們去縱容罪惡。譬如台愛將軍（General Dyer）如果是臥疾，甘地必要看護他，可是倘如他自己的兒子無廉無恥地胡鬧過日，他必不繼續供給他。反面說來，他還說：「因爲我對他的愛，使我不得不斷絕供給他一應的使用，雖然這或許要致他於死，也是無法的。」因爲無論何人，都沒有用武力來強迫他人做善的權利，「但是他必要用離開他的方法來抵抗他，而不顧及這種方法的結果如何，假如他已悔過了，便應當開懷接納他。」（一九二〇，八月二十五日。）

當甘地約束暴動份子的時候，他同時也鼓勵躊躇的人即速決定。對那疑懼不決的人，他鼓勵他們說：

「在這世界上，沒有一種事不是用直接的動作而能成功的。我不用「消極的抵抗」這一個名詞，因為牠的意義并不完全……：在南非洲，我們可不是宣傳直接行動麼？斯末資將軍（General Smuts）可不是因為這種宣傳那麼劇烈而受感動麼？耶穌和釋迦所宣講的比較大一點的教理是什麼呢？是不是慈愛二字呢？可是釋迦無所懼怕地領兵入敵營去克服一羣高傲的僧人；耶穌在耶路撒冷的殿裏逐出兌換金錢的人，并從天上降下災殃於偽善者及法利賽人，可不都是直接的行動麼？但是雖然他們滌除污朽，而在他們的一舉一動之中，終表示出不能錯誤的仁慈和恩愛。」（一九二〇，五月十二日。）

甘地同時也請英國人放開量度。（一九二〇，十月二七日，致在印度的英人）他用「親愛的朋友」稱呼英人，并敘明他曾經做過他們的忠實的朋友三十餘年，但是因為政府的負約，纔把他對政府的好意的信仰打消。他懇求他們對於政府負約的事，設法補救。他說他對英人的勇敢和佩服其他民族的勇敢的精神，尚有信仰。他說：「在戰場上的勇敢，印度人是不能做到的了，可是心靈上的勇敢，還有我們的份。不合作運動的意思，無非是要訓練犧牲的精神；我希望由於

「己的受苦，能够使你克服。」

在運動初期之四五個月中，甘地并不是想由不合作而使政府癱痿，他的意思是想要求定基礎，為建立智識上，道德上和經濟上都能獨立的新印度。他用沙德希 (swadeshi) 這個名詞來表達印度經濟獨立的意思，這個意思只能是沙德希的狹義和物質上的解釋而已。

印度應當節省奢侈，應當受難而無怨。嚴厲的紀律是道德的必要的拱衛，國家的健康和品性都必因之而受益。甘地第一件要作的事，便是除去印度的酒毒。各地應有戒酒的團體組織，歐洲的酒一概抵制，酒商也都應當把賣酒的執照呈出。（一九二〇，四，二八日；一九二一，六，八日；及九，一日。在一九二一，三，二三日致商人的信中，他懇求他們停止售賣酒精，在一九二一，六，八日致穩健派諸人的信中，他懇求他們幫助他作成這件事，雖然在別的事上，意見不能一致。同時，他還提倡拒煙，拒其他麻醉品，及他種藥料的運動。）全印度都響應他的請求，拒酒的運動，如潮般似地遍地興起。這般熱烈的運動，使甘地不得不反而設法禁止羣衆劫奪酒商店裏的貨品，并強迫酒商關閉店門。他對羣衆說：「你們斷不可用武力來強迫他人作善。」

但是要使印度戒酒是一件比較容易的事，要供給印度的生活必需的物品，那纔是難做。假如印度不和英國合作，牠要靠什麼來養活呢？假如歐洲的產品斷絕，印度的布要從何處得到呢？甘地對於這兩個問題的解決方法，極爲簡單，而且表出他腦中的中世紀的思想。他的方法是：介紹紡織的輪機，并恢復印度的家庭紡織工業。

這種武斷式的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自然是要受譏評的。（甘地自己也知道必定有很多人要笑他，但是他說，縫衣的機器可不用針麼？紡織的輪機還沒有失了他的功用呢！并且反過來說，在現在的時機，沒有一種東西是比牠重要的。紡織是全國所必需的，而是千萬饑餓的人民的唯一求生之路。）但是我們應當考慮印度的情形，和甘地對於「查爾喀」（Charka）的解釋。甘地從未曾說除了最窮的人以外，紡織能夠供給一個人的生存，他但說在農事休閒的幾個月中，紡織可以作一種補助的工業。印度的問題，并非學說上的，而是事實上的，是急在眉睫的。印度的人口，有百分之八十是農民，所以實際上每年有四個月無事，而且普通有十分之一的人口，是受着饑饉的壓迫。中流的人，也都衣食不飽。英國對於這種情形，曾作何種補救的方法呢？沒有，

一點兒也沒有。不但沒有，她反而加重其災。因為英國的工業，把本地的工業摧殘淨盡，並且吸收印度的富源，每年使全國流出六十兆以上的盧比。印度自植的棉花，本是自己需用的，也被迫而整千整萬地輸出於日本及蘭開夏，乃由被二處，作成棉布以輸入於印度，印度也不得必出高價來買牠。故此，印度第一件要作的事，便是抵拒這種破壞國內工商發達的外貨，而為達到這個目的，起見她必要自己組織商店，與自己的人民以工作和糧食。這種事，立刻便要辦到的。那麼，除了家庭紡織的工業以外，便沒有較為迅速和經濟的工業了。這樣的計劃，并不是要使工資較優的農夫放棄他的工作來從事紡織，而是要使那無事的人，和那不賴工作以生活的，如婦人和童子，以及其他每日有一部分時期閒着的印度人，都利用閒着的時間來紡織。故此，甘地的訓令是：

- (一) 抵制外貨；
- (二) 教授紡織的技藝；
- (三) 純粹地消用手工織物。

甘地以不絕不倦的精神，為這種思想而奮鬥。他說紡織是一切印度人的責任。(一九二一，二日) 他要貧窮的孩童每日紡織幾小時，以代還他們的學費。他要一切的人，無論男人或婦人，都每人每日至少作一小時的紡織，就算牠是施捨一般。他把選擇棉花和紡織等物的方法，與

及其他一切紡織的精細技術都詳細寫明，他確實地把如何購買手工織物的方法，指示那願意購買的人，無論他是大家庭中的家長，或是學校中的學生。他說明，比喻說吧，一個人要用極少數的資本，來開一間沙德希的舖子——一間專賣印度工業出物的舖子——同時又要賺百分之十的利潤的方法等等。當他敘述印度一種紡織的古樂的時候，（一九二二，二，二日）——這種古樂，是紡織的詩人迦米爾（Kabir）和織他自己所戴的小帽的奧倫賽王（Aureng-Zeb）所歡悅的——他也成爲音樂化了。

甘地的魄力，能把羣衆的情感燃燒起來。孟買（Bombay）的貴婦也願從事紡織。印度教和回教教的人都願意一律穿本國布，本國布卻成了時髦了。就連太戈爾（Tagore）也贊美迦打或迦地（Khaddar or Khadi）——即是手工織布的印度名稱——說穿起來很有意思。四處來定貨的，連續不斷，有的卻老遠的從亞丁（Aden）和俾路芝士坦（Baluchistan）寄來的。但是沙德希的信徒卻未免有點做的太過，因爲他們連外國的原料也要抵制。甘地本來是很精明不偏的人，在這點上，也就不免糊塗了。在一九二一年的八月，他令把孟買（Bombay）的

外國貨都燒了，這就好像當薩佛那洛拉(Savonarola)王的時候，在佛羅稜薩(Florence)地方，有很多美麗的傳家的寶物，和珍貴的物料，積疊成堆，在羣衆的熱情和歡呼之中，用火燄來把牠燃燒一般。關於這件事，在印度的心胸闊達的英國人中，有一位太戈爾的摯友安得魯君(O. F. Andrews)給甘地一封信。信中他一方表明他對甘地的敬仰的意思，而一方卻表示把這很多寶貴的物燃燒而不施給窮人的確是可惜。他再說他相信這種破壞的程序，會滋長羣衆的最壞的本能，而他對於這種以破壞爲信條的國家主義之發起，不得不表示反對。他總覺得毀滅人類從勞苦中得來的果實，是罪惡的。他以先是贊同甘地的運動，而也變服迎打——土布——了，但是現在他卻懷疑這樣繼續下去是對的。他對甘地的信仰，卻因這焚燒布物的事而動搖了。

在把安得魯君的信發表於印度青年(Young India)的時候，甘地說他一點也沒有想悔。他並不是對於任何種族有什麼惡感，也並不是要求把一切的外國貨都焚燒了。他唯一的要求，不過是把有害印度的貨物燒了罷了，無數的印度人，因被英國的工廠打擊而破產，工廠奪了他們的工作，使他們成千成萬地變成爲下等流民和傭僕，使他們的妻子，都變成了娼妓。所以印度

已早有仇恨英國人的趨勢了。甘地并不想增加這種仇恨，他反而要使牠變更其方向，由於仇視英人，變爲仇視英貨。購置英貨的印度人，其罪惡適與售賣英貨的英人相等。物料之焚燒，并不是表示對英國的仇恨，而是印度決心與過去分離的一種表號。這是一種裁去疣贅的必須的辦法。假如我們把這種毒物施給窮人，那就錯了，因爲窮人也有廉恥的意識呵。

3

印度的經濟生活，應當先擺脫了外國的壓制，但是第二步應做的，便是要解放思想，創造一個真的獨立的印度精神。甘地要他的同胞都除去了歐洲文化的權威，而他自己的一樁最榮耀的功績，也就是他安定了一個真正的印度教育的基礎。

在英人的統治之下，亞洲文化之餘燼，只是半絲不斷地在各大學和學院中保持其靜止的狀態。差不多經過四十餘年了，亞力加 (Aligarh) 還是一個印回合辦的大學，是一個在印度的回教文化之中心，而加爾塞 (Khalsa) 大學，爲塞克 (Sikh) 文化之中心，班拿勒斯 (Benares) 大學，則爲印度文化之中心。但是這幾個已近陳舊的大學，都是依賴政府的，由政府供給維持的。甘地

盼望要把這些大學改變爲純粹的亞洲文化中心。在一九二〇年，他在亞米達巴得 (Ahmedabad) 則創立了古茶拉特 (Gujarat) 國立大學。牠的理想，是一個團結着的印度。印度教徒的達磨 (Dharma) 法和回教徒的伊斯蘭 (Islam 回教名稱) 便是牠兩種宗教的柱石。牠的宗旨，是要保存印度的語言，并用牠爲全國革新的源泉。(一九二〇十一月十七日) 甘地秉着他最公平的態度，「覺得系統式的亞洲文化的研究，並不次於要研究歐洲的科學。」聖斯克利特 (Sanskrit 謂梵語) 阿拉伯 (Arabia) 波斯 (Persia) 巴利 (Pali) 和馬伽狄 (Magadhi) 等處文化的寶庫，都應加以搜索，以發見民族力的泉源。這種理想，並不是單要滋育或重述古昔的文化，而是要憑着過去的風俗，和近時的經驗，以造成一個新的文化，換句話說，即是要綜合影響印度的生活，或受印度本土的精神所影響，而生存於印度的各種文化，爲一種新文化。這種綜合，將自然而然地爲沙德希式，而不爲美洲式，即是各種文化，都有牠應有的地位；而不是以一種優勝的文化併吞其他一切的文化；因爲以一一併吞其他，其目的只是一個「人爲和強制」的統一，而不是趨向於「調和」。在這國立的大學之中，一切印度的宗教都有課程，印度教人可以研究

可蘭 (Koran) 而回教徒也可研究沙斯塔刺斯 (Shastras) 簡單說一句就是牠不相信在人類中有什麼事不可拿出來討論，而牠所摒棄的，也惟是這種摒棄的精神。印度斯坦的語言已定爲必修的科目，因爲牠是聖斯克利特 (Sanskrit) 痕都 (Hindu 中印度語) 及波斯化的烏耳都 (Persianized Urdu) 的通語。校中不但由於研究的方法以培養獨立的精神，而且尤特別注重於職業之訓練。

甘地盼望緩緩地組織了高等學校，使教育傳播於各鄉鎮以普遍於一般的羣衆所以……不久便可將受教育與未受教育的兩種階級的致命的裂痕彌縫起來。并且因爲儒雅的人都應受工藝的教育，而工藝階級也應受文藝的訓練的緣故，財富分配不均和社會衰怨的呼聲，也可因而減少。

甘地反對歐洲的教育方法，因爲牠只知一味發達智力，而藐視了手工的訓練，他要一切的學校，從小學以至於大學都編入手工的科目。他相信學童用紡織來代還學費，是一種最好的方法，因爲他們由此可以學習做活，以爲生活獨立之準備。至於心之訓練，歐洲是完全把牠忽略了，

而甘地則自始便注重牠；但是在學童未能正式受訓練之先，應當豫備了一班合適的教員纔對。所以這種甘地所視為新教育的基石的高等學校，也就是專為訓練教員而設的。這種學校，并非平常的學院或學堂，更適當一點，還不如直稱為道院，因為牠將集合印度的聖潔之火，以備將來放光於全世界，正如昔日在歐西俾尼狄克丁 (Benedictine) 的修道院中的教士放光以征服人們的靈魂和土地一般。

甘地在亞米達巴得 (Ahmedabad) 的沙特雅格拉 (Satyagrah) 道院——他的師範學校——中所立的管束教員的規則，比着管束學生的規則還多，并且教員都應作道院式的宣誓。在平常的宗教儀制中，這種宣誓，不過是純粹的消極性質，即是宣言不做等等罪惡的事，而於這種道院中，他們卻憑着一種積極的犧牲和博愛的精神而宣誓。他們所應宣誓的，計有下列諸款：

1. 誠實的宣誓。平日不說謊，還不算誠實，就是為國家的利益，也不應當說謊，這所謂誠實到底，就是因此而反對父母尊長，也是必須的。

2. 戒殺的宣誓。不殺一切的生命，還不算戒殺，必要對於心中所信為不義的人，不加以

傷害不加以恨怒，并反而愛他，纔算够足。要反對專制和暴虐，可是不要傷害專制者或暴虐者，只是用愛來征服他；就是因反抗他的命令而致於受刑至死，也是甘心的。

3. 獨身的宣誓。如果不是獨身，以上二種宣誓便差不多不能遵守。不以羨慕的眼睛看着婦人，還是不足。凡是獸的嗜欲，都應根本鏟除，使思想上也沒有淫邪的意念。假使入院的教員已經結婚了，便應以他的妻爲他終身的朋友，而保持一種純潔的關係。

4. 節制口味。食物應當節約，和保守清潔。非必需的，或是足以刺激性慾的，都不可食。

5. 不偷盜的宣誓。不竊平常所視爲他人之財產，還是不足。假如我們的消用是多於我們所需的，便是偷盜了；因爲「天然」每天只給我們以一天所需之物，並沒有剩餘的。

6. 不擁產的宣誓。不擁有多量之財產，還是不足。凡是我們的肉欲所不絕對必需的，都不應當擁有，并常常想及簡單我們的生活。

除了這幾種主要的宣誓以外，還有下列幾條次要的規則：

1. 沙德希。凡是帶有欺騙的嫌疑的物品，都不用牠。凡是製造的物品，也皆不用，因爲工人

在廠裏受了無限的苦楚，而製造品則是他們受苦楚受剝奪的產品。外國的貨品和經過複雜的機器所造成的貨品，都應本着一種愛護真理——亞喜米沙 (ahimsa)——的精神拒絕牠，而用本國土織的粗布。

2. 無畏。凡是懷着畏懼之心而作事的，都不能為真理——亞喜米沙 (ahimsa) 的信徒。真理的信徒應當不怕帝王，不怕民衆，不怕宗族，不怕家庭，不怕盜賊，不怕凶匪，不怕猛獸，和不怕死。一個真無畏的人才能拿出真理的力量或靈魂的力量來抵抗他人。

這種鐵的基礎的要點擬定了之後，甘地便迅速地顧到其他必要的條件，其中有二條最注重的，便是令教員（一）自己操執勞力上的工作，尤以農作為最，以為學生模倣，和（二）諳明印度各種主要的語言。

道院的學生，從四歲以上便可入院，但是一經入院之後，便須修完全部的課程，約須十年的工夫，纔可出院。入院的，都必和父母及家庭分離，父母應放棄一切對於他們的權力，而他們也不准見他們的父母。他們所穿的，是純樸的布，所食的，是屬於植物質的簡單的食料。雖然他們於每

一週中有一天半可以作個人自由創作的工作，可是就放假日的平常的意義說起來，他們可算是沒有放假的日子。每一年中，他們應花三個月徒步旅行印度。他們都應當學習印度和德拉維達的語言，英文則列為必修的第二國語。除此之外，他們還必使自己熟識五種印度語言的文字。〔烏耳都(Urdu) 孟加拉(Bengali) 坦密耳(Tamil) 忒勒古(Telegu) 和狄瓦尼基利(Devanagiri) 〕凡歷史，地理，算學，經濟，或聖斯克利特語(Sanskrit)等科目，都用他們自己的語言課授。他們同時也學習農事和紡織。宗教的空氣，已透入於此教育制度之全部之中，那是不必說了。當他們修完了一切課程的時候，他們可以任意決定留校或離校，倘如是留校，便應為上列種種的宣誓而升為教員。在求學中，學費是完全不須的。

我這麼詳細地敘述甘地的教育制度，一方是因為由此可以見出他的運動的高尚的精神，一方是因為他自己把這種制度擬為其全部運動的主要的源泉。要建設一個新的印度，必要從印度的分子中造出一種純潔和強健的新的靈魂，而這種新的靈魂，惟有賴一班聖潔的信徒，像基督的信徒一般，願做世界的鹽的，纔能夠發育滋長。甘地，並不像歐洲的革命者，並不是一個創

立法典的人，他是一個新的人格的建设者。

4.

英國政府，正如其他的政府一般，在這種情形之下，并未加以注意，起初牠的態度，也只是輕逸牠罷了。在一九二〇年八月，印度總督查姆斯福特公爵 (Lord Chelmsford) 說這種運動是一切無意識之計劃中之最無意識者，但是這冷然的態度，不久也就改變了。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政府也稍起驚惶，而出一種恐嚇和嚴厲的公告，警告人民說這次運動的首領所以能尚安然不受拘制者，也無非是因為他們沒有宣傳暴動的緣故，現在政府已經下令禁止，凡是越過這個範圍，或是煽動革命及暴動的，都應緝拿究辦。

這和平的界線，不久也使衝破，但是首肇其禍的，卻是政府不合作的運動緩緩擴大，牠的力量也漸次伸張，政府也遂起嚴重的惶恐。在十二月，事情更轉凶險。在十二月之前，不暴動的不合作運動還被視爲一種和平運動的嘗試，政府還自以爲等到印度國民大會 (National Indian Congress) 於那哥普爾 (Nagpur) 開十二月份的會議的時候，不合作案可以被否決，但是事

情并不如所豫料的，不合作案不但不被否認，而且國會反把牠的意旨，定入於憲法之第一節中，其文如次：

印度國會以由於合法及和平的方法，由印度的人民，求得自主 (swaraj) —— 自治 (home rule) 爲宗旨。

由是，國會遂追認九月非常會議所表決之不合作案，并從而加以擴充不暴動的原則，固然是絕對地贊許，但大多數的意思，都以爲要作一回共同和持久的運動，便應盡力把印度的一切份子都聯合起來；因此國會不但令印度教人和回教人忠誠地合作，而且還催促有權階級與被壓迫階級也都聯合一致。除此而外，國會又根本地更改憲法，實際上可算是組織了一個全印度的代表制度。⊖

① 在那哥普爾 (Nagpur) 的會議中，到會的代表有四七二六人，其中四六九人爲回教人，六五人爲塞克人 (Sikhs)，五人爲帕爾西人 (Parsees)，二人爲「不可接觸」者，四零七九人爲印度教人，一零六人爲女人。

新定的憲法規定每五千居民必舉出一個代表，故統計代表之總數，應爲六一七五人。國會每年聚會一次，會期定在聖誕節左右。國會另以其會員三百五十人，組成國會委員會，凡國會之表決案及政策，皆由該會執行；在國會閉會之時間內，該會有與國會同等之權力。國委會更由其會員十五人，組織執行委員會，其對國委會之關係，適與內閣對國會同，國委會更有解散執行委員會之權。

那哥普爾 (Nagpur) 的國會，更擬定一個由各省議會委員會所組成的級制政府 (Hierarchy) 以代表二十一行省，并十二種語言，各村鎮的委員會，都使隸於牠的管轄。國會更建議組織一隊國家服務員，定名爲印度國家服務團 (Indian National Service)，牠的經費，則由印度自主基金項下支取 (All India Tilak Memorial Swaraja Fund)。

凡是有四個安那 (印度幣名，約合國幣五分) 的國民，無論男性或女性，如果他或她已經簽了憲法的信條，便有選舉的權利。不論何人，凡是上二十一歲而宣誓服從憲法第

一條并合意贊同憲法的正文及附則的，都爲合格。

國會承認不合作運動於目前所取的形式，不過是一種先備的步驟，將來必有一個時候，可以做到完全的不合作，即是包含拒絕納稅運動。牠自己對於這種事實，也并未加以隱藏。這個「時候」總要待將來決定，可是目前牠爲着要籌備將來之進行起見，便不得不鼓勵紡織和使抵制更爲嚴厲；同時，牠又發出給學生父老和官吏的通告，請求他們更加熱烈地爲不合作運動。凡是不贊成國會的議案的，都不能爲政治上的活動。

國會的議決案，實際便含有在一個國家之中再建一個國家的意思，即是建立一個真正的印度自治政府，以與英國政府相對抗的意思，這是英國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也就不能不對付牠了。在這種情形之下，英國政府要不是開戰，便是要議和；如果牠願意退讓，而決定議和，那麼，要求得一個和結，是很容易的，因爲國會已經宣告如果可能的話，牠要向英國求達牠的目的，倘如不然，便自己做去，不顧她了。但是歐洲的政治倘如牽連及其他的外族，從來就不講和的；這一回也何非如此。因此，英政府也決定用武力來壓制，而盡力搜求種種用武，種種口實，以爲憑藉這種可

爲藉口的事，那裏能沒有呢。

甘地和國會雖然都主持不暴動的原則，可是在印度也免不了有幾處暴動；這些暴動，實在和不合作運動沒有多大關聯，可是仍然停止不了。在阿拉哈巴（Allahabad）諸省，有屬於土地的暴動發生，卽是田佃起來反抗地主，因警察的干涉，而肇流血的慘劇。這事發生沒有多久，塞克（Sikhs）的阿克利運動（Akali Movement）本來是純屬宗教的性質，也採用了不合作的方法，而因鼓動的結果，在一九二一的二月，有二百個塞克人被殺。凡是有良心的，都不能把這些慘劇的責任歸咎於甘地或他的信徒，但是政府卻以此爲一種好的機會。在一九二一年三月，政府便開始用武力來壓制，以後便隨歲月而更加嚴厲。政府的借口，是爲保護印度的酒商，以防免受羣衆的傷害。歐洲文化之和酒精攜手，這回也不是頭一次。自由組成的不合作社團，都被解散。防害公安的集會，都被禁止。在幾個省中，警察都授以全權行事，以壓制這被稱爲革命和無政府主義的運動。印度人被捕的，可以千萬論計，有很多享有名望的印人，也被簡括收監，并受種種不人道的待遇。這樣的舉動，自然要激起了一般的熱血，所以各處人民和警察發生衝突的事，也幾不

絕於耳。有幾處房屋被焚燬了，人也被傷害。當國會委員會於三月底在比札瓦達 (Bhawada) 開會討論「文的反抗」(civic disobedience) 的時候，印度的情形便是這樣。憑着奇罕的豫料和懦弱，「文的反抗」的提案終被否決，牠的理由是本國還未豫備操用這兩邊快利的劍。反抗的事，將來總要實行，但是目前只可作人民和財政的調動。

在這時候，甘地對於聯合全印度的運動，更繼續地活動得利害。他用洛克斐勒 (Rockefeller) 的精神，來號召帕爾西 (Parsees) 人——多少帶有腐化色彩的富商，如甘地所說的——并號召印度教人和回教人，請他們合組一個堅固的同盟。印回兩種的關係，因彼此的偏見和疑懼，從來便互相仇恨的，甘地卻用盡心力，來使他們和睦合作。他知道要使他們鎔合是不可能的，所以便只能用友誼來使他們聯絡。①

① 在敘述他對毛拉拿穆罕阿里 (Maulana Mohamed Ali)——回回人——的友誼的時候，甘地說他兩人都忠於他們的信仰。

甘地不願意把他的女兒嫁給阿里的兒子，也不願意和他共飯，毛拉拿穆罕阿里也是

這樣。但是這對於他們彼此相愛相敬和相幫助，並沒有阻礙。

甘地並不是說印回通婚，或者合食是一種應被責罰的事，但是他說在現在卻是不能辦到。要使印人和回人達到這種銜合的地步，最少也要一世；所以凡是求實際的政策，應當不持起這一層。他並不是反對這種改革。而是以爲時候還沒有臨到，所以目前惟一的重要的事，便是使他們互相敬仰，彼此推誠相見。這一點，也可表明他的實事求是的見識。（一九二一，二十。）

可是甘地所最致力的，還是在於拔救印度的帕里亞人（Pariahs）——被壓迫的階級。（帕里亞，即印度之最下級人民，爲其他階級人所最賤視的。）在這壓迫他們的污濁之社會之中，他的爲他們呼籲的情感，和他的暴怒及悲哀的呼聲，已可單獨地創立他的不朽的榮譽。他這種對被迫階級的感情，從他小時已種下了根原；他自己敘述當他小時有一個帕里亞人常到他家中來作苦工的情狀，人家告訴他說不好和他接觸，如果他和他接觸，便非齋戒沐浴不能使自己清潔。他不明白其中的理由，而常常問他的父母這是什麼意思。在學校的時候，他常常和這班不

可接觸的人接觸，他的母親告訴他說要免除這種不聖潔的接觸所生的效果，只有去撫觸一個回教徒。由甘地想起來，這是一回最不公平和最無理由的事。在十二歲的時候，他便立心要把這一點印度教徒的罪惡除去。他計劃如何救出他的被遺棄的同胞。當他爲他們的幸福而呼籲的時候，他表出他最公平坦白的心胸來。他說，如果有人能證明「不可接觸」（卽卑視帕里亞而不敢與之接觸的意思）是一種宗教的信條，那他寧可拋棄了他的宗教，（宗教在他，不啻爲其所有的一切）由此可見他如何重視他們的幸福了。從他看來，帕里亞的制度，已可使外國對印度所加的一切不公平的事變爲公平的。他說：

假如印度已經成爲英帝國的帕里亞，那就是公平的上帝所定給我們的公平的報應……在未請英國人洗去他們手中的血跡之先，印度教人是否必先將自己手中的血跡洗淨呢？「不可接觸」是我們的污辱，牠使我們在南非洲，在東非洲，在加拿大都變爲帕里亞人。印度教人一日以「不可接觸」爲宗教中的一部分，印度的自治便一日不能求得。印度教人已先犯了罪了，英國也不過是照她的樣做罷了。做人的第一個責任，便是保衛弱者

及無依者，和不傷害任何人的情感。假如我們沒有把我們對我們的懦弱的同胞所做的罪惡除去，那我們也無異於禽獸和野人了。

甘地要印度的國會給帕里亞的同胞設立學校，並給他們的水井，因為帕里亞人不能用公共的水井。但是到現在來怎麼樣呢？要是袖着手等待這班特殊階級的人來改變他們的暴惡，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甘地便自己跑就帕里亞人，自己領起首領的責任，來組織他們。他和他們討論關於他們的問題。他們應當如何做呢？向英國政府聲訴罷？還是投歸英國政府處置呢？這不過是換了一重奴隸關係罷了。那麼，拋棄了印度教罷？「好，一個胸懷闊達勇敢的印度教徒！」信從基督教或清真教罷？假如印度教真的袒護「不可接觸」，那恐怕他就忠告他們這般做了。但是印度教並不袒護牠。「不可接觸」不過是印度教徒中一種薄弱的疣贅，終要被割除的。帕里亞人要為自衛而組織起來。自然的，他們也可對印度教採取一種不合作的原則，大家斷絕與印度教人往來。（不想從一個像甘地那麼愛國的人的嘴唇，會說出這麼勇敢的一句社會革命的忠告！）但是困難的就是帕里亞人中沒有領袖，不能自己組織起來。所以最好的，還是請他們聯合大家

的不合作運動，因為牠的目的還適合於一切的階級。真正的不合作是一種滌除罪污的宗教上的動作，所以凡是相信「不可接觸」的，都不可以參加。這樣，甘地便把宗教、人道和愛國三者合攏起來。

當甘地第一回組織帕里亞人的時候，他也履行過一種莊嚴的禮節。在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三及十四兩日，有一個被壓迫階級的大會在亞米達巴得 (Ahmedabad) 會集。甘地任這會的主席，并在席上發表他一篇最美麗的演詞。他不但是要求取消帕里亞的制度，而且催促那班不可接觸的人——帕里亞人——乘此起來施展他們的本事。他說他盼望帕里亞人在新印度的社會中，會做偉大的事。他設法使他們有這樣的自信心，并把他自己燃燒着的理想，灌入他們之中。他說他在這被壓迫階級之中，看出那可以成功的潛伏着的力量。他相信，在五個月之內，「不可接觸」的階級，必可賴着自己的能力，取得牠在印度民族中所應享有的地位。

甘地自身已樂得及看見他的呼籲，在人民的心中，得到響應。有很多地方，帕里亞人都受釋放。○在甘地被捕之前一日，他作一次演講，敘述帕里亞運動的進步。婆羅門的弟子，也皆贊助。高

等階級也作很多表示其憐憫和慈愛的事。甘地自己說出一個婆羅門的弟子的故事，說他不過十九歲的年紀，而自願去作一個清道夫，以與不可接觸的人共同過活。

①在一九二一年的四月尾，「不可接觸」的習慣已漸次消滅。在很多村莊中，「不可接觸」的人已可和印度教人雜居，并享受與他們同等的權利。（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可是在別的地方，情形還是可悲觀的，特別是在馬達拉斯（Madras）。（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印度國會從這時起已把牠列為討論的事件，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間，那哥普爾的會議也表示有廢除不可接觸的制度的意思。

5.

甘地以同樣豪放的精神，從事於另一種大的事業，這種事業，就是婦女解放的運動。

性的問題，在印度是一個特別困難的問題，因為牠已受了一個普遍，難堪，和指導不得其法的肉慾的洗禮了。童婚已使國家的肉體上和道德上的能力痿頓。男性的腦中，只存着滿足肉欲的心念，這對於女性的尊嚴上，不啻是一種侮辱。甘地把婦人們對於印度國家主義運動者對女

性的卑賤的態度，的埋怨發表了，他本人卻袒護女性，他說，她們反對的言詞，正足以證實印度還有一種和「不可接觸」的禍害相等的痛瘡。但是婦女的問題，並不是純粹的印度問題，而是全世界問題。這件事，也如他對帕里亞人一般，他盼望被壓迫者自動起來做事，而不盼望壓迫者解放她們。他告訴婦人們不要再把她們自身看爲一種滿足男性肉慾的物品，以求得并鼓起人家的敬仰。他要她們忘記了她們的肉體，而投身於社會事業，不顧一切的危險，雖然因此有種種的效果發生，也只好爲信仰而忍受苦楚。婦人們不但應當放棄一切的奢侈品和拋棄或焚燬外國的貨物，而且又須分擔男人的問題和艱辛。在加爾各答（Calcutta）的地方有很多上流的婦女都欣然就獄，這正足以表明適當的精神。婦人應當爲應做的事業，而和男人競爭從事，不應當求着人家的憐憫。在犧牲的時節，每每婦人的精神超過於男子；所以婦人們都不用恐懼，就是最瘦弱的，也必能保存她的光榮。「凡是知道如何死的，必定永遠沒有驚懼。」

甘地並沒有忘記他墮落的女同胞。「一九二一，七月二一，八月十一，十二月十五日」他把她們在安得哈拉（Andhra）和巴利薩爾（Barisal）省開會時對她們所說的談話，都說

出來。他很嚴正和簡單地對她們說，她們也回答他，信任他，並請求他的忠告。他設法為她們謀一種正常的生活，他向她們建議。要她們從事紡織。她們都同意。假如大家一定與她們以贊助，則她們在隔天便可馬上起工。因此，甘地便轉向印度的男人，教他們尊敬女性：

在罪惡之中博得勝負的。在我們的革命之中並沒有牠的地位。自主的意思是我們應當把每個印度的居民，都作弟兄姊妹一般的看待。在兩性之中，女性並不是較弱的，而是較優的，較尊貴的，因為就是到現在來，牠還是犧牲，忠誠，慈善，忍難，和智慧的實體。婦人的直覺，常常證實較男人的自作聰明的智識，更為真確。

在印度的婦人當中，從他自己的妻論起，甘地常常得到聰明的幫助和了解。從她們中間，他得到了幾個最得力的門徒。

6.

在一九二一年，甘地的權力，已達到牠的最高點。就其為道德上的領袖上說。他的權力，已是極大。何況又有幾乎無所限制的政權，不求而歸地擁戴到他的手裏。人民都把他當作聖人。他的

像也都畫作斯里克里斯拿 (Sri Krishna) 的模樣 (在一九二一年六月份的印度青年甘地反對這種舉動) 在年終的時候——十二月——全印度的國會 (All India National Congress) 把斯里克里斯拿 (Sri Krishna) 的權授給甘地，并給他以指定其承繼者的權柄。他是印度政策的惟一之操縱者，在這時候，如果他以為妥當的話，他真可以起政治的革命，甚至於宗教的改造。他並沒有這樣做。他并不要這樣做。這是為屬於道德上的莊嚴呢？還是良心上的狐疑？或者是兩種原因并有，也未可料。一個人的心，要由別一個人來了解牠，并非容易，而尤以由一個屬於另一種族和文化的人來了解牠，更是特別困難，那麼，要捉摸一個像甘地的精神那麼深沉紆曲的人，更是難了。在這擾亂的年頭，在這很多迷失的事都在印度發生的情境之下，我們要斷定究竟那舵夫的手并不顫抖，而常常堅定地引導那昂大的舟循一定的海道前進與否，那真是難說得很。但是，我還想試把我自己對於這個「生存着的謎」的感覺說明。我要憑着我對於這個偉人的宗教上的景仰，及我因他的真誠而感動的真誠，說明我的感覺。

假如甘地的權大，他濫用這種權柄的危機也是一樣的大。他的運動已經達到這步田地，只

要略起微波，便可影響千萬的人，所以要引導牠，而同時又要在這騷然的大海之中，保其鎮定的心境，也就日見其難了。我們要使那浮動而無所壓迫的羣衆的情感，和那中和而遠慮的理智，互相調合，恐怕是超於人的力量所能解決的問題。這溫存而虔敬的舵夫，祈禱和依賴上帝，但是那告訴他的聲音，在這風濤怒吼之中，已差不多消失了，那裏又想牠會傳達到其他的人呢？

他的脚跟，並沒有被虛榮所搖動的危險。沒有一回贊頌他的事，會使他轉頭，並且反而要使他受惱，使他覺得不自然。在一般先知和主持神祕者之中，甘地可算是例外，因為他并無看見異象，也並沒有默示。他并不想使他自己相信他是受一種超於自然之力所指導的，他也并不想使他人這樣相信他。他所有的，只是光輝煥射的真誠。他的額際，永是鎮定和明晰。他的心，純沒有虛榮。他也和其他的人一般，同是一個人，而并不是一個聖人。他不要人家稱他爲聖。（可是，他的狀態，證明他的確是聖人。）

他說，在現在的生活中，聖字應該被裁去。

我如其他良善的印度教人一般地禱告。我相信我們都可以做上帝的使者。我并沒有

帝意旨特別的暗示。我的堅定相信是：他每天都對我們各人啓示，但是我們都閉了耳朵，聽不見他的聲音……我並不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我只是一个印度和人類謙遜的奴僕。我並沒有重新創立一派的欲望，如果我想創一新派以爲他人跟從，那便是太過分了，因爲我並沒有代表什麼新的真理。我只想跟從并代表我所知的真理。但是我的確想做的，是在許多舊的真理之上，放射以新的光明。（一九二〇年五月十二日，一九二一年五月廿五日，七月十三日，八月廿五日。）

就他的性格上說，他常是謙遜，并極端的正直，不管他是印度的愛國者，或是不合作運動的信徒，他終不致於心胸狹小。他不贊許專制，就是牠對於事業上有幫助，也是一樣的反對牠。政府的壓迫，必定不要代以不合作運動的壓迫。（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八日。）他并不是要使他的國家富強起來，以反抗其他的國家。他的愛國的熱誠，并不限於印度疆域之內。他說：「在我，愛國和仁愛並沒有分別。我愛國，因爲我是人，并有人的情感。我的愛國心并不是排斥其他的。我并不想傷害英國或德國，以服事印度。在我的生命的計劃之中，帝國主義並沒有牠的地位。如果一個愛

國者對於人道是冷然不關的，那麼，他也算不上是一個愛國者了。」（一九二一，三月，十六日。）但是他的門徒是不是這樣感覺呢？在他們的脣裏，甘地的主義又是怎樣呢？並且，經過他們解釋之後，傳達到民衆去，又是怎樣呢？

當太戈爾 (Rabindranath Tagore) 遊歷歐洲數年之後，於一九二一年八月回歸印度的時候，看見印度人的心思改變。不禁驚愕。在他回歸之前，他已早由於他從歐洲所寄給他在印度的朋友的一批信中，表出他的焦慮。這一批信，有好些在現代評論 (Modern Review) 上發表，甘地和太戈爾兩人都是哲人，都是互相敬仰，可是他倆中間的裂痕，就像在一個哲學者和一個信徒，一個聖保羅和一個柏拉圖中間的裂痕一般，他們的駁論，是重要的；因為在一方面是一種想創造一個新類人的宗教的「信仰和仁愛」；而另一方面是一個想於同情和了解之中，把全人類的氣息都聯合起來的生而自由和清明廣博的「智慧」。

太戈爾常常把甘地視為聖人，而我也常聽他很虔敬地道及他。當我提及托爾斯泰 (Tolstoy) 以與甘地相比照的時候，他告訴我——我現在纔知道我更知道甘地了——甘地的精神

比托爾斯泰的更爲光明和炫耀。在甘地一方面，一切都是自然的——謙遜，簡單，和純潔——他一切的爭鬪，都是由他的宗教的真誠而犧牲；但是在托爾斯泰一方面，則一切都是傲慢反抗，傲慢，怨恨，反抗，怨恨，和情慾反抗情慾。在托爾斯泰，一切都是暴動的；就是他的不暴動的主義，也是暴動的。在一九二一年四月十號，太戈爾在倫敦所寫的信有這麼一句話說：「我們感謝甘地，因爲他給印度一個機會，以證明她對於人的神聖的信仰，還是仍然存在。」他對甘地的運動，固然是曾發表過懷疑的言論，但是當他離開法國以歸印度的時候，他仍是誠摯地想由種種方法以幫助甘地，就至一九二一年十月的宣言——即是他們兩人正式破裂的文章（訴之於真理）此文之內容，請留在後面討論——他開端還是贊稱甘地，他所贊稱之言辭，是在一般贊稱中之最美麗者。

甘地對太戈爾的態度，是很誠愛的，就至他們不和睦的時候，也沒有變更。我們覺得甘地很不願意和太戈爾辯駁，他的親愛的朋友有的在他面前背述太戈爾私下口說的話，以加重他們的駁論，甘地老是停止他們說話，而說明他應當如何感激太戈爾和如何負了太戈爾的。

①見一九二二，二月九日，甘地所發表之神聖而不可發表之文中。在這篇文章裏面，甘地敘述他和太戈爾的長久的友誼，他是太戈爾在聖提尼克丹 (Santiniketan) 家的常客，他也把太戈爾的家視爲他的隱休之所。當他在英國的時候，他的兒子都住在那裏。但是他倆中間的裂痕，終不免於更加深闊。從一九二〇年，太戈爾對於甘地以其盈餘之愛和信，以從事於政治上的目標——這在提拉克 (Tilak) 死後已是如此——已表示不滿。甘地之插身於政治舞臺，自然是不是欣然願做的事。但是當提拉克 (Tilak) 逝世的時候，印度便沒有政治的領袖，而不得不有一人補上的。

這正如甘地所說的：

假如我像是參加政治了，這便是單純地因爲今日之政治盤繞着我們，正如大蛇盤身一樣，無論我們如何掙扎，終是解脫不了的。但是我還要和蛇爭鬪……我正在設法使宗教參入於政治。

但是太戈爾仍是對他抱憾。他在一九二〇年九月七日所寫的文章中曾說：「我們需要麻

哈德麻甘地所代表的道德的力量，而在這世界上，只有他能代表的力量」這種貴重的寶庫，負有以「靈火使死的復活」的使命，可惜牠竟投棄於脆弱之政治之舟上，任衝碰激昂的情欲之波不絕地打擊，這真是印度的極大的不幸，徒把精神上的財富，用於依抽象上的道德之真理所認為無價值的問題，誠是應當惋惜的。「我們如把道德上的力量變為武力，則我們便是犯罪了。」

這便是太戈兒對於衆所喝采的不合作運動，和因般遮布 (Punjab) 之屠殺及托着哈利發 (Khalifat) 的事而鼓起的暴動所持之態度。他恐怕這運動的效果，會使那易受刺動的民衆，因一時之暴時而起攻擊。他要人民的腦中，都忘記了復仇。他幻想着不可能的報復。他要他們把不可恢復的，都忘記了，而聚精會神為印度建成一個新的靈魂。他雖然敬仰甘地的主義，和他的犧牲的精神熱烈的火燄，但是他恨不合作運動中有「不」字的成分。依着他的天性，他對於一切有「不」字的事物，都抱着避開的態度。

這種信仰，使他將印度教的積極理想——即是要求歡迎生命的享樂，但必要使牠淨潔——知佛教的消極的理想——即是要求壓制享樂——作一比較。(一九二一，三月五日) 關

於這點，甘地回答說：剷除的工作，正與接納的一般重要。人類的進化包含這兩者之總和。優婆尼沙曇 (Upanishades) 的末一字是一個「不」字，牠的作者對於印度教徒的定義是 *neti* 「不是這個」。印度已經失了說「不」的權力，甘地把牠恢復回來。艾維草是和播種子一般重要的。

但是太戈兒顯然不相信剷除的工作。在他詩的沉思的生命之中他滿足於現實的事物，而只以牠們的和協爲快。在他美麗的詩句之中，他說明他的意見，但都離開了現實的生活。他的字句，好像納塔拉閣 (Nataraja) 劇中——一種幻景的戲劇——的跳舞一般。他說他想使他的精神和當時佈滿於全國的空氣調協；但是他不能做到，因爲不管他自己的意思如何，他心中終有一種反抗的精神隱隱不滅。他說：「在失望的黑暗之中，我看見一個微笑，聽見一個聲音說道：『你的地位是在世界之海的海灘上，和兒童們一塊兒遊戲，在那處，我也和你同伴。』」他用詩歌來作劇，并發明新的音節，「繼續地發出他的和協的聲音，有如兒童們在陽光之下跳舞，并帶着笑聲不見了。一切的事物，由他看起來，都是快樂，花和葉都純是并未停止過的音節。上帝自己

便是一個最高的術士，他和時間玩弄，播星球和行星於表現之湍流之上，并以充滿着迷夢之紙舟，投入於時光之河裏。「當我請求他允我爲他的門徒，并讓我將我幾種發明的玩物放入於他所欣樂的舟中時候，他只是微笑；我便跟着他走，挽住了他的衣袖。」在這裏，太戈兒覺得他是在自己的地位。但是當我在羣衆之中，四面受擠的時候，我是在何處呢？誰能了解我所聽見的聲音呢？假如我聽見歌聲，我的嗓子必能連着牠的音節而合唱，因爲我是一個歌者。但是在羣衆的狂慢的喧呼之中，我的聲音已喪失了，我也暈眩着了。」在不合作運動的喧呼中，他想求出一種音節，但是不能求得，因此，他便對自己說：「假如你不能跟你的同胞在他們的歷史中的一個最爲危險的時期一同前進，你要提防着說出他們是錯的，而你是對的的話；但只離開你的隊伍，走回詩人的處所，并預備接受譏笑和羣衆的慢罵。」

一個哥德 (Goethe) 一個印度的哥德 (Indian Goethe) 巴卡斯 (Bacchus) 也是這樣說。就此看來，好像太戈兒的意思已經從此決定了。他對不合作的運動告別，因爲牠含有否決的成分，他退回到他所自作而盤繞着他自己的創造之迷術之中。但是他還不只止於退出。他說，運

命決定他必駕駛他的舟以反抗時潮。在這時候，他不只是一個「詩人」，他還是亞洲派往歐洲的精神上的大使。他剛從歐洲回來，在那裏，他請歐洲的人民和他合作，在聖提尼克丹（Santipur）的地方建一個世界大學。這是一個多麼可笑的定數，在世界這一邊，他正在宣講東方和西方合作，而同時在世界那一邊，卻有人正在作不合作運動的宣傳。

因此，不合作運動對他是雙方受損，一方是他的工作，而一方則為他的生命的觀念。他說：「我相信東方和西方的真團結。」

不合作運動和他的思想相衝突，因為他的腦力，他的豐富的智慧都受過世界一切文化的滋養。他說：「人類的一切最偉大的，都屬於我。」至大無邊的人格——如優婆尼沙曇中所稱之名詞——惟有由全人類的宏大的和協中生。我的禱詞是盼望印度代表世界一切民族的合作，為印度的幸福，合則為真理，分則為罪惡。合的意思，是包含和了解一切，因此，牠不能由於「不」中求得。我們現在想把西方的精神和我們的精神分開，這的確是一種精神上自殺的嘗試……當今的時代是西方得勢，這是因為西方負有完了一種使命的責任。我們東方的人，應當跟着他

們就學。我們所抱憾的，自然是我們已失了珍重我們自己的文化的能力；因而不知道如何使西方的文化上牠正當的軌道。但是如果因此便說我們和西方合作是不對的，那便無異於促進地方主義（provincialism）的最污劣的形式，而所生的效果，也惟有智能上的缺乏而已。這是一個世界的問題，沒有一個國家能由於與其他國家分開以使自己得救。要得救，便是大家都得救，如果不然，便只有同歸於泯滅。」（一九一一，三月十三日。其全文更見於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份的現代評論 Modern Review）。

換句話說，太戈兒之拒絕西方的文化，也如哥德（Goethe）在一八一三年之拒絕法國文化一般。甘地主義，並不是真的在東方和西方中間建起了一堵高牆，可是太戈兒知道印度的國家主義一旦被鼓起，必定有人把牠這樣解釋。太戈兒怕那排斥的精神之發展，當他的學生在合作運動初起的時候來請他的忠告，他便對他們說明他的懷疑和焦慮的感覺。學生罷課是爲的什麼呢？他問道：「學生要犧牲——爲的什麼？並不是爲求得一個更完滿的教育，而是爲求得一個無教育。」在沙德希第一次運動的時候（印度第一次自治運動，係於一九〇七至一九〇

八年在孟加拉 (Bengal) 發生) 有一羣少年的學生告訴他假如他命他們的話，他們便可立即離校。當他拒絕他們的要求時，他們都很激怒地離開他，並對他的愛國心發生懷疑。

在一九二一年的春季，當印度起初抵制英國學校的時候，太戈兒在倫敦已見過一次智識界愛國主義的挑撥動作。當他的朋友披爾遜教授 (Professor Pearson) 講課未畢時，有幾個印度學生便發出錯誤的國家主義宣言。太戈兒非常生氣，在他給聖提尼克丹 (Santiniketan) 的管理處處長一封信中，他責罵這種不耐的精神，並把牠的責任歸之於不合作運動身上，甘地對於這點回答說：

「我並不想把我的住屋四邊都圍起牆來，也並不想把我的窗戶都塗塞起來。我要各方的文化，都盡其量地在我屋旁吹動……但是我不要任何文化吹走了我的腳跟……我所主張的，並不是一種監獄的宗教。牠盡有地方容納上帝所創造中的最微小的。但是牠是反抗種族，顏色，或宗教的傲慢之證據。」

接着甘地便說出他對於英國文學之教育的懷疑，因為牠對於建造人格上並沒有貢獻，他

說，這是一種閹割印度青年的教育。他一面表示對於他說過分的話抱歉，一面說他的態度，并不偏狹——如太戈兒所暗指的偏狹。

這都是很光明堂皇的話，但還不足以使太戈兒釋疑。太戈兒并不懷疑甘地，可是他怕甘地的信徒。在他由歐洲回歸印度初和他的人民接觸的時候，他便起初怕人民對於麻哈德麻甘地的話的迷信。他看見心靈的專制之危機已漸迫近，在一九二一年十月的現代評論（Modern

Review）上他發表了一篇真的宣言，訴之於真理（An Appeal to Truth）這便是他反抗這

種盲從的呼聲。他這回的反抗特別地強硬，因為開端他先對甘地作一篇很美麗的頌詞。在敘述

九〇七及一九〇八年印度初次的獨立運動之後，接着他便說當時的政治領袖都是受着一

種書獃氣的理想所感動，而模倣柏克（Burke）格拉斯敦（Gladstone）馬志尼（Mazzini）

及加里波的（Garibaldi）教人的模樣，他們的主張，也惟有那受過訓練的人才能懂得。簡單說來，便是他們是主張一種英國式的理想。但是麻哈德麻甘地出來了，他停止於千萬個貧人的門檻上，并如他們一樣地穿着。他用他們自己的口腔對他們說話。這便是最後來的真理，而不單是

從書本上摘錄出來的話了。麻哈德麻的名字——印度人稱呼他的名字，也的確是他的真名。因為除他之外，還有誰像他那樣覺得和人民親密呢？覺得他們是他自己的血肉呢？隱藏着的靈的力量，已應着甘地的號召而怒發，因為他使真理成爲一種切實而可見的東西。在數千年前，當釋迦使人們明了慈悲和仁愛應實現於人們中間的時候，印度也會應他的號召而放發其新的偉大。牠受奮起新的生命，發出牠的力量於科學和財富之上，而傳播過於沙漠和海洋。無論商業或車事的征服，都不能像牠這樣堂皇地傳播於遠地。因為，惟愛乃是真理。

但是太戈兒的口調也就此而改變。贊頌的話也就此終結。卑劣的言詞便接着生出。當太戈兒在歐洲和越渡海洋的時候，他覺着印度的偉大之復活的震動。他受其刺激而充滿着呼吸這新的自由之惠風的希望，以回歸自己的母國。但是他到了母國，便覺得掃興了。他覺得有一種壓迫的空氣存於人民之上。他說：「好像有一種外壓的力壓着他們，研磨他們，并使他們衆口同聲地依着同種口腔說話。無論在何處，我都覺得文化和理智的威權應當退位，而讓盲從去施威。靈魂的真自由，也就這樣簡簡單單地受着一種憑着表面的自由的口實的勢力所壓倒。」

我們明了太戈兒的疑慮和他的聲訴。這都是各時代所通有的事。在新的基督教發軔之初，破碎的舊的世界之所稱爲最終的自由意志，也曾這樣疑慮和聲訴。就連我們自己，當逢一種盲然信從某種社會或國家的理想的潮流時，也覺得有同樣的疑慮在我們心中鼓動。太戈兒的反抗，是自由的靈對於時代的信仰之反抗，因爲這種信仰對於少數訓練的人是最高的自由，而對於其所領導的民衆，則無非是另一種桎梏而已。

太戈兒所評擊的目標，遠非民衆之狂熱所能了解的。在這盲從之民衆之上，牠打到麻哈德麻本身來。不論甘地如何偉大，他所從事的事業，是不是超過一個人的能力所能單獨負擔的呢？像印度這麼大的事業，當然不好依賴一個單獨的領袖的意志所主使。麻哈德雖是愛和真理的領袖，但是要謀得自主卻是一種非常繁重的事。「路途是紛亂和難於開拓。情感和熱心雖然

是必須的，但是科學和思想也是免不了的。全國的心靈上的力量都應同來貢獻。經濟家應該籌劃實際的解決方法，教育家應從事於訓練，政治家應爲之考慮，而工作者則從事於工作……無論何處求知的欲望都應得其自由而不受抑阻。無論何種壓力，不管牠是公開的或是隱藏的，都

不應當存在於智慧之上。」……「在昔時，在原初的森林之中，我們的先聖於其完密的眼視中，招集一切的真理追求者……爲什麼那願引導我們起事的聖人，不爲同樣的號召呢？」但是甘地到這時的惟一發出的命令只是「紡織」太戈兒問道：「這是否是一種新的創造的時代的福音呢？假如大的機器在歐洲成爲一種危險，小的機器能不能給我們一種更大的危險呢？」不單是一國中的力量應當彼此合作，各國的力量也是應當合作。他說：「印度的醒覺和世界的醒覺是相連結的。無論任何國家，如果牠想將自己關閉起來，便是違反了新時代的精神。」接着，太戈兒便敘述幾個他在歐洲所遇見的人——那解開國家主義的桎梏以服事人類的人——那成了世界國民中之受壓迫的少數份子的人——他把他們列於聖尼亞森斯之中，聖尼亞森斯是指那一班在自己的靈魂中已現實人類大同的人，那一班捨棄自己生命以使人類爲一個整個的團結的人。

太戈兒問道：印度是否應該獨自背諗那消極的理論，永久固着於他人的罪過之上，而以仇恨爲基礎以求得自主呢？當天方黎明小鳥醒覺的時候，牠不單只想得食；牠的兩翼，禁不住天空

的招呼而飛舞牠的咽喉，充滿了歡迎白日的可愛的歌聲。一種新的慈愛發出牠的聲音。我們要讓印度自由去回應。在黎明的時候，我們的第一種責任便是要記住那混然爲一不分階級或色采的他，那由於其所具有的各種不同的力量，依着必須的限度，以賜與各個階級和一切階級的需求的他。我們請向這個給我們以智慧的他禱告，請他使我們都彼此了解，聯合爲一。

太戈兒美麗的詞句，好像是一首陽光的詩，在一切人類的爭奪之上，建其均平的世界。我們唯一可批評他的，只可說其所置的平線太高了，反隱沒了線底下的種種不平。由於永遠的時光看起來，太戈兒是對的。小鳥的詩人，如鷹的天鷄——海涅（Heine）這樣稱呼一位樂者——眼看着時代的崩潰而歌唱。他是在永遠的時光中生存。可是現刻的要求是緊迫的，每一個經過的時候，不單是要求立即——倘如是不完全的——的補救，而且又爲之而喧呼強求。那缺乏詩人的清高——或是爲仁慈救世而捨棄了牠——的甘地，乃因爲這種緣故，而視答復太戈兒的問爲一種兒戲。

在答復太戈兒的問話中，甘地的言詞較以前的又更表出更爲劇烈的情調。在一九二一年

十月十三日的印度青年上，他這篇很可感動人的答復發表了。甘地感謝那「偉大的邏卒」^①因他警告印度，使她免陷入前面的陷坑。他也和太戈兒同意，說最重要的是在維持一種自由的精神。

我們應當不讓我們的理智屈服於任何人的操縱。對於愛的盲然的屈服，常要比受專制之壓迫而屈服更爲有害。如果屈服於兇暴，還可有希望；倘如是屈服於愛，則了無可望了。

太戈兒是一個邏卒，他警告前面有固執，疎忽，褊狹，愚蠢，和怠慢種種仇敵之迫近。但是甘地不覺得他的疑慮是合理的，麻哈德麻常是依從理智。印度并不是單由盲從而發動。假如全國都決定要採納紡機，這也不過是經過一方詳細的考慮而然的。太戈兒所說的是忍耐，而他自己則滿足於美麗的詩歌。但是還有戰爭呢，請他放下他的七弦琴吧！請他等戰爭過後再唱吧！當房屋失火的時候，住房的人都應當出來提水撲火哩。

①偉大的邏卒是甘地復文的題目

當我四週的人都饑餒頻絕的時候，惟一的職業應許我做的，便是給他們以糧食。印度

是一間遭火的房子。她正因饑餓而殞絕，因為她沒有工作可賴以得食。庫爾拿(Kuhna)正在挨餓。那割讓的區域 (the ceded districts) 也正接連地在度過第四個饑荒。奧理薩 (Orissa) 是每年都有一度饑饉。印度是日頻於窮困了。她四肢的血脈已差不多要停止流動了。假如我們仍不看顧她，則她必要完全瓦解……

對於這無工作而餓着的人民，惟一的可接納的方式上帝所敢主持的，只有工作和應許以等於食物的工資。上帝創造人來工作以求食，并說，那不工作而就食的，是偷竊。我們應當念及在今日那千萬個挨餓頻死，比於禽獸尚不可及的人。饑餓便是使印度提起紡機的理论。

詩人是為明白而生存，並且又要教我們都照着他做。他向我們敘述那可愛的景緻：在天亮時，小鳥向着天空飛舞，並唱着贊美的詩歌的景緻。這飛鳴的鳥，無非是已經得到了牠們的糧食，而鼓起安息已久的兩翼，這兩翼中的血脈，已從前夜便充實了新的血液了。但是我也曾看見那缺乏能力的鳥，要想設法使牠振旗鼓翼而尚不可能，那是多麼可憐。

在印度的天空之下，那譬如小鳥的人，在他醒覺的時候，已比他假裝着安息的時候更爲瘦弱。在千萬的人們看起來，生命已是一種永遠的苦楚，無刻可以安息的了。我已知道要用加比爾 (Kabir) 中一首詩歌來安慰那臥疾呻吟的人是不可能的呵。

給他們工作，使他們可靠以得食吧！「我是不須賴工作以求食的，爲什麼也應紡織呢？」或者有人要這樣問。我能不勞而食，乃是因爲我食那不屬於我的。我是劫奪我同胞以度我自己的生活的。請你詳細考究你袋中金圓的來源，你便要曉得我所寫的真理了。無論何人都應紡織。請太戈兒也如他人一樣地紡織。請他將自己的洋服焚燬了；這是今日的責任。明日的事，上帝自然會去照顧的。如季達經 (Gita) 裏面說：「依着正道做去！」

這是多麼黑暗和悲苦的景緻！在這裏我們眼見世界的苦楚在藝術的夢之前伸張起來，而且對牠說：「你敢斷絕我的生命麼？」誰不和甘地的情感表同情而共爲之擔憂呢？

可是，在甘地那樣倨傲和激烈的答詞之中，也的確有使太戈兒疑懼的地方：譬如他只教人跟從，而不讓他說話，便可爲例。服從沙德希的法條，而不讓你討論；沙德希的第一種命令便是紡

！他好像是這樣說。

在人的戰爭中，無疑的，紀律的確是一種責任。可是很不幸的便是那受有執行紀律的權柄的領袖，有時卻是腦根不大明達。他們或會把那為求達一種理想而選出的紀律，認為是那理想的本身。紀律用牠的嚴厲處來誘惑他們，因為他們惟有在窄小的道路上才感到愉快。他們把沙德希視為主要的，不是視為求達目的的方法，而是目的本身。在他們的眼觀中，沙德希好像已經得了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性質。有一位甘地的信徒叫做卡勒爾加爾 (Mr. D. B. Kalelkar) 的，他是在亞馬達巴得 (Ahmedabad) 的沙特雅格拉哈 (Satyagraha Ashram of Sarbarat) 學校中當教授，可算是和甘地最為接近的了。他寫了一本沙德希的福音，親得甘地的序文，並在序文中甘地又明為認許。這本小書，是專對一般街上的人宣傳的。論卡氏本人，也可說是在直接由於沙德希的本源得到教訓中的一人。我們現在請詳細考察他所敘述的信條。

「上帝不時現身於地上以救世人，他的現身不一定要成為人形……他可以現於一種抽象的主義，或是一種提拔世界的理想……他的最末的現身便是在沙德希的福音之中。」

他知道假如沙德希是單解釋爲抵制外貨，則他所說的話，只可使人付之一笑。沙德希是「一種將使世界免除戰爭和仇恨及解放人類的大的教義。」抵制外貨不過只是行其一部吧。牠的精髓可見於印度教經典中：

「你自己宗教的達磨 (Dharma)——即是說，你自己宗教的定數或拯救——雖是不完全，也是最善的了。如果你完成非你所應做的達磨，則必常有危險發生。惟有那做他指定的本分的工作的人，才能得到快樂。」

沙德希的根本法條是從對上帝的信仰中生出來的。「上帝是永遠地籌備着世界的快樂。他把各個人放在爲完成其本人的工作所最適合的環境之中。一個人的工作和他的志望，應該適合於他在世界的地位。我們不能任意選擇我們的文化，正如不能任意選擇我們的誕生，家族，和國家一般。我們應當接納上帝所賜與的；我們應當接納世俗相傳下來的風俗習慣和教義，好像牠們是出於上帝所說的；並把信從牠們當作一種嚴正的責任。凡反抗儀俗的，便是犯罪。」

由於這種前提，便可推論到一國的人民，應當保守自己，不和外國往來的理論。

「沙德希的信徒，永不把試改良世界的虛大的責任放在自己身上，因為他相信世界是被動的，並常常跟着上帝所排定的法則走去……我們應當不盼望任何國的人民，為他國的人民預備他們所需要的物品，就是為慈善的緣故也是不應當，並且假如這事是可能的，也是寧可沒有的……沙德希的真信徒，並忘記任何人都是他的兄弟，但是他的本分是在完成他的環境所規定給他的工作。我們應當服事我們的母國，正如我們應當在這我們所生出的時代，做拯救我們自己的工作一般。我們的靈魂的解放，必須由於宗教和我們自己的文化中求得。」

可是，如果一個國家要利用種種機會來發達自己的工商業的富源，究竟可以允許她嗎？這的確是不可以的。要發達印度的工業嗎，這祇是一種無價值的奢望吧！而且真的這樣做，便是教百姓犯他們的達磨了。無論是輸出自己的產品，或是輸入外人的產品，都是罪過。「因為改化主義是和沙德希的精神衝突的。」依着邏輯推論起來，這種學說的結論，便是輸出一國的思想也和輸出貨品一樣的是罪過，這的確可使歐洲的人驚奇了。假如印度在歷史上曾受過痛苦的

屈服，這便是因為祖先們和埃及和羅馬通商所積下來的罪過的責罰，而且這種罪過，又是代代相衍下來的。任何國家，或是任何階級，都應當盡忠於牠的本職，生存於自己的富源，並依從自己的儀俗。

「我們應當防止和那風俗習慣和我們不同的人發生親密的關係。我們應當不和那些理想和我們不同的人混雜。……各個人都是一條小流。各個國家都是一條大河。他們都應當清澄明潔地跟着自己的河道流去，直至流入了拯救之海時，才相混和。」

這可不是國家主義的凱歌麼？這可不是最狹義和最純粹的國家主義的凱歌麼？老住在屋子裏，關起了四面的門，不變更什麼，什麼都保持原狀，什麼也不輸出，什麼也不買入，祇是提高和潔淨自己的身體和靈魂！這真是中世紀的僧人的福音了！可是，像甘地那麼遠達的人，也准把他自己的名和牠發生連帶的關係！

○可是，在這本福音中，也有很偉大和美麗的話。不要報復，「過去的是過去，過去的已是不可挽回來。牠屬於永遠的時光中之一部分，我們不能挽回來反對牠。不要用報復的手段

來責罰已往的「不平」和「過失」請讓已死的「過去」埋葬牠自己的屍體。祇在這生存着的現在中做事，心在裏面，上帝在前頭。」

這全部書，從頭到尾，都充滿着一種冰河的寒潔的氣味。

太戈兒的迷惑，若從這種反動的國家主義的迷夢上解釋，便可得其原委了。這種反逆時代潮流，把自由的靈魂放入籠中，並焚燬一切和歐西連接的橋樑的信徒，當然是要把他挽回的。可是實在說起來，甘地的主義一點也沒有那種意思。這可由他答復太戈兒的話中見出來，他說：「沙德希是一種傳播給世界的消息。」這樣，世界還是存在的，甘地並沒有忽略牠，而也未會反對改化主義的。他說：「不合作運動不是對準着英國或歐西的人反抗。我們的不合作運動是對準着物質文明和因物質文明而生的貪婪和侵略弱者而反抗。」換句話說，便是反抗歐西的誤點，故此，歐西也將因之而得益。「我們的不合作運動是我們自己中間的一種休退。」一種暫時的休退，以使印度能把自己的力量集合起來，然後才以之奉獻於人類，以爲之服勞。「印度應當先學習生存，然後才能爲人道而犧牲生命」甘地並不禁止和歐洲合作，不過他要歐洲順從他

爲人類設立的理想之後，才能够合作吧了。

①太戈兒對這種文章特別易受刺激，因爲甘地的 Ashram 和他的 Santiniketan（即彼各人所設立之學校）中間，已有一種競鬪發生，這種競鬪，他們兩人都想設法消除的。在一九二二年二月九日，甘地在印度青年上發表一篇文章，在裏面他埋怨一位記者錯引了他的話，使人覺得他對他的 Ashram 所說的話，好像是批評太戈兒的 Santiniketan 一般。甘地述明他對太戈兒的學校的敬意，並有點滑稽地說假如他要決定那一個學校爲更好的，他必選 Santiniketan 而不選 Ashram 因爲兩個學校比較起來，Santiniketan 在年歲上或智慧上都可說是大哥。但是甘地說：「請 Santiniketan 的信徒留心這小的 Ashram 的發展吧！」

甘地的真主義比着他所認許的福音裏面所敘述的是廣汎得多，仁慈得多，和普遍得多了。可是爲什麼甘地把他的名借給這本福音呢？如什麼他讓他的宏大的理想囚入一個印度神權國的狹小的囹圄之中呢？要提防着信徒們呵，他們愈純淨，便愈有毒害。上帝，請你保護那偉大

的人，使那些祇得其一部的理想的朋友，不至於損壞他在把他的理想寫成教條的時候，他們常破壞了牠的和協，這和協正是他的生存着的靈魂的真正的福祐。

○依我推想起來，甘地的總括無外的精神，也和太戈兒一般，不過是方法不同而已。甘地是一個由於他的宗教的情感而成的世界主義者，而太戈兒則是一個在智慧上的世界主義者。甘地並不排斥任何人參與禱告和行日常的職任，正如那第一班基督教徒不分別猶太人和異班人，惟同時與以同樣的心靈上的規訓一樣。這正是甘地所想做的，而於此處也便是他的狹小處。這種狹小，並不是說他的心，他的心是和一位基督的心一般的寬大；他的狹小，祇在於他的智慧上的偏狹的精神，（而這又是一位基督所同有的。）甘地是一位中世紀的世界主義者，我們一面尊敬他，而同時又一面明了和贊同太戈兒。

但是，還不止於此呢。在他身邊的門徒，最少還染有一點他的偉大的氣質；但他的門徒的門徒呢？甚至於其他的人士和一般的民衆呢？等到主義傳到他們的耳朵裏，已成了一種暗昧和破碎的回聲了，他們那能吸收得什麼真理呢？很不幸的，他們所看得到的主義，不過是那主義的

最粗和最物質化的形式，即髣髴是那主義教他們由於紡織以期待自主之降臨。這是一切程序中之最消極者。這是原初未開化時的方法（Fuori Barbari）。太戈兒看這班宣傳不暴動的信徒卻自己暴動起來，甚至於甘地也不能絕對地不暴動，便不免於驚愕。甘地說假如他覺得自己有仇恨英人的意思，則他必要引退而不問事，因為一個人雖是恨他仇敵的行爲，可是他必要愛他的敵人。「仇恨撒旦的主義，而愛惜撒旦本身。」這樣的區別，在平常的人似乎有點難於分得清楚。因而在每次國會開會的時候，領袖們儘管對英國人的罪惡和奸險發揮激烈的理論，而不提防着在水閘之上已積起了怨恨和奮怒的熱潮，真可當心水閘被牠衝破呵！當甘地答復太戈兒的友人安德魯（Andrews）君說明他爲什麼於一九二一年八月在孟買（Bombay）焚燬貴重的物料的時候，他說：「他要把對人的惡的情感移到對物上面去。」他並不知道民衆的怒氣正在興旺，而憑着本能的指示他們自然而地想，「第一是物，第二是人。」他並沒有預見在三個月內，在這同樣的孟買的地方，人將要成爲殺人的劊子。甘地是太神聖了，他是太純潔了，太沒有隱藏於人中的獸性了。他並沒有夢想到這些獸性隱伏的人民之中，一旦得其言之逗引，而從

他們中發動起來。太戈兒是比較清楚一點，當他們暴露歐洲的罪過，宣傳不暴動，和因而同時在百姓的腦中種下了不能不暴發的毒根的時候，他已早料到他們所包圍的危險。但是這種危險，他們並不覺得，他們的心，是相信沒有恨意的。但是那要引導人的領袖，必定要知他人的心拍，而不單知道自己的。要提防着羣衆呵！自己要當心呵！(Cave Canemi)一個甘地的心靈上的教規不能夠抑制牠。要牠不至於走出軌道，要使牠順服領袖的嚴肅的教規，或者是只有一條路了，這條路便是使他升爲上帝的現身，正像那一般暗裏盼望他作斯里克里斯拿 (Sri-Krishna)，而照着斯里克里斯拿 (Sri-Krishna) 的樣子畫他的像一樣。但是甘地的誠實和他的謙卑阻止他這樣做。

因此，在這咆哮着的人海之上，祇存着這最純潔的人的聲音，祇存着惟一的一人在上面計劃。這聲音能耐多久呢？這真是一回莊嚴和悲切的期待呵！

第二編

1.

在一九二一年，不合作運動進行甚為迅速。這全年卻是一個不定，期望和暴動的年頭。甘地也不免於反映着牠的震動。

敵意老早已經發長了，在政府用殘暴的壓制方法來鎮服牠的時候，牠便暴發起來，而為公開的革命。在馬爾根 (Malgaon)，那西克 (Nasik)，計里的 (Giridih)，貝哈爾 (Behar) 各處，都發生暴動。在一九二一年的五月初旬，阿撒母 (Assam) 地方發生了激烈的衝突。在茶園中有一萬二千個工人停工，政府便召集廓爾喀 (Gurkhas) 的兵士末攻擊他們；因此，在孟加拉 (Bengal) 東部的鐵路工人和輪船工人都起來組織實行二個月罷工，以示反對。甘地用盡他的力量，來使他們平息。在五月，他曾和印度總督勒定伯爵 (Lord Reading) 作一次很長的談話。他同時也同他的力量來感服阿里的同胞，因為有人說是他們用挑動的演詞來激起暴動的。

甘地還能夠勸息他的回回教的同胞在直接上或間接上皆不爲暴動。

可是不合作運動的威力，還是隨着時日而發長。回回教的份子尤其特別地無所顧忌。比喻在七月八日，在喀拉蚩 (Karachi) 的全印度哈利發會議 (All-Indian Khilafat Conference) 重述回回教人請求之後，便宣告不準任何回回教人在英國兵隊中服務，或是幫助招募。再進一層，牠又對政府表示如果政府對安哥拉 (Angora) 首領的態度不變，則牠必要宣告印度共和國之成立，並在國會於十二月開會的議席上，提倡革命。在沒有多久之後，——七月廿八日——國會委員會 (依新憲章所選出之第一次委員會) 在孟買 (Bombay) 開會，議決抵制宣告行將來印的威爾斯王子 (Prince of Wales) 並宣告在九月三十日以前，實行開始抵制外國的原料。並且，牠又想出方法來鼓進和調節國內的紡織，和促進一種更爲劇烈的組織，以爲戒酒的運動，而不管政府對於酒商之贊助。可是這委員會總比哈利發會議中的回回教人穩健些，牠反對革命的趨勢，並反對抗逆政府，而只是主張更劇烈地爲不暴動厚則之宣傳。

在八月間，摩普拉人很兇蠻地發動革命，並維持過了幾個月的時光。甘地決定要和毛拉拿

穆罕阿里從加爾各答 (Calcutta) 到馬拉巴爾 (Malabar) 去試鎮壓牠，但是政府卻把阿里和他的兄弟毛拉拿賽克的阿里和其他幾個回回人的首領囚禁，說他們在哈利發的議席上嘗贊同抗逆政府。阿里兄弟被囚禁的消息傳出後，中央哈利發委員會 (Central Khilafat Committee) 便在德里 (Delhi) 開會，一致表決承認哈利發會議的表決案。印度各處，有無數的示威運動發生，表示民衆的擁護。在十月四日，甘地宣告他的運動是和回回教人的運動互相聯結的。在一篇經過五十位全印度國會 (All India Congress) 中的顯著的議員所認許的宣言中，甘地宣告每一個印度的公民，都有發表他對不合作運動的意見的權利，並且說，無論任何印度的人，不論文職或武職，都不應在這個於道德上，政治上和經濟上皆有侮辱印度的政府之下服務。他以爲和這樣的政府斷絕合作，是一種應盡的責任。在喀拉蚩 (Karachi) 地方，阿里兄弟皆受裁判。他倆和其他被囚禁的首領都受判定二年的禁錮。

這種處分，更使印度加倍地憤烈。全印度國會於十一月四日在德里承認甘地的宣言。由於最後一票之決定，該會遂令各省人民自己負起責任來宣告反抗政府，而以拒絕納稅爲發端的。

步驟。可是凡「反抗者」——即反抗政府的人，於此稱爲「反抗者」，以示與革命者或叛亂者有不同處——都應當先宣誓他絕對依從沙德希的程序，包括手工紡織，並誓言永不暴動。換句話說，就是在甘地的指導之下，該委員會想將反抗政府的程序，與「服從紀律」和「犧牲自己」的主張聯結起來。爲因要使這種運動的惟公無私的性質顯明起見，委員會便先向「反抗者」聲明不論是他們自己或是他們的家族，都不能從委員會中得到錢財上的幫助。

在十一月十七日威爾斯王子抵孟買的時候，大規模的反抗運動已將見其成效。中等階級和下等階級都進行抵制的程序，但是富人，巴拉斯人（富商階級）和做官的都完全不顧這種運動。他們的態度不免激起了民衆的憤怒，因而民衆便乘着憤怒搗毀富人的房屋，劫奪屋中的財物。這回的暴動，沒有一家可告倖免，就是婦人的房屋也同樣遭難，有很多人彼殺，也有很多受傷的。這便是惟一的一回暴動。在印度其他部分，都是按規守矩地實行哈爾多爾（Hartal）（停工）一點兒也沒有事故發生。但是孟買的暴動便如箭穿心一般地傷了甘地。當他聽見暴動的消息時，他匆速地走到暴動發生的地點，並當民衆宣呼歡迎他的時候，他的抑制情感的心念並

不知道有何限制。他憤怒地命他們各歸行伍，並立即命他們解散。民衆靜默地聽從他的話，可是才走開沒有多遠，又是暴動起來。那最壞的份子好像是忽地裏從地下鑽出來，因而這二萬個憤怒騰起的民衆，便一時不能挽回來服從理智。可是這暴動還祇是限於一定的區域，牠所毀壞的還不及歐洲最微小的革命發動時所毀壞者之一半。但是甘地因此遂對孟買的人民和對不合作運動者作很痛心的聲訴，並宣告這樣的事事故可證明民衆還未到可反抗政府的程度。故此，他便中止發出反抗政府的命令。因為要擔起他的信徒暴動的罪過，於每一週中，他作一次二十四小時的宗教式的禁食。

在印度的歐洲的僑民，對於孟買的暴動，雖是駭異，但是印度全國一致的沉默的哈爾多爾 (Hardal)，在他們看起來，更是嚴重。他們催促印度的總督與以制止，因而各省便接續頒布了很多高壓的法規。在一九〇八年印度曾爲防止那年的暴動而制定一條對付無政府主義者和秘密團體的法律。在這時候，政府便引用這條律來壓服全印度國會和哈利發會議所發起的義勇團。人民因入團而被囚禁的，每次必以千計，但是這不過使更多的人民自動加入該團，而受省委

員會的訓練吧了。同時，當威爾斯王子定於十二月二十四日巡視加爾各答的時候，該地方便於是日實行哈爾多爾 (hartal)。在那天，威爾斯王子只見一個完全沉默和了無人煙的城邑。

當印度國會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在亞米達巴得 (Ahmedabad) 開會的時候，全國各處都好像是冒着革命的黑煙，等候爆發為火燄。這個會議，有一股嚴重的空氣，好像是法國一七八九年革命將終時的全級會議 (Etats-Généraux) 一般。會中的主席，剛被囚禁。討論時的言辭也極簡單。該會重新宣告對牠不合作運動的信仰，並請全國人民都自動加入義勇隊，並預備給政府囚禁。牠又催促民衆在各處組織民衆大會，並在說明文的反抗 (civil disobedience) 較於武力的反叛同樣有效而更合於人道之意見之後，便建議當人民都曉得不暴動的眞精神的時候，該會便立刻要採納反抗的步驟。爲預料散會後必有許多會員被囚的緣故，該會便把全會的權柄，委在甘地一人身上，請他在實際上爲狄克推多 (dictature de facto)，並允他自由選定他的繼任者。這樣甘地便受委爲獨斷印度政策的首領。該會對於甘地的權柄，只給以一種限制，這種限制便是不准他變更全國的信條，和在未得該會之委員會同意之前，不許

和政府講和。當時會中有一派人主張表決贊成暴動的議案，並在必要時宣告印度獨立，但是那信從甘地的主義的多數份子，卻把牠否決。

在會議散後的幾個禮拜中，全印度都佈滿一種宗教化的熱情。有二萬五千個男人和女人，都歎然就捕。在他們之後，還站着無數的民衆樂意犧牲自己來證明他們對於印度的運動的信仰。

2.

甘地再度相信實行反抗的時機已經成熟。他將在孟買省中的模範區域巴多利 (Bardoli) 地方，先起實行。在這個地方，人民大都是曉得他的思想和信服他。在一九廿二年二月九日，他給印度總督一封公開的信，信中敘明他的程序。那封信是一封溫雅而顯明的宣戰書，甘地說他是不合作運動的首領，並聲明他負起不合作運動的責任。巴多利 (Bardoli) 將為第一個不暴動的分子起來對於一個侵害言論，結社，和出版的自由的政府，表示反抗。甘地限制勒定伯爵 (Lord Reading) 於七天內聲明變更政策。如果他不願意或是不能做到的話，則他將宣告反

抗的命令。e

⊖有一百四十個村落，和八萬七千個住戶。

⊕在同日的印度青年報上，有一篇註解更表示出顯明的態度。假如印度總督不答復他，則反抗的命令必要公布就，是違反多數人的意思也所不顧。

這信才剛發出去，便有一回比其他的暴動更爲利害的事故發生。在哥拉克普爾 (Gorakhpur) 的綽里綽拉 (Chauri-Chaura) 地方，民衆的遊行剛才走過，有幾個離伍的人在後邊受了警察的干與和侮辱。當民衆乘怒攻擊警察的時候，警察便開槍反擊，等到把子彈都打完了，便逃入坦拿 (thana) (警察的駐所) 裏面躲避。民衆沒有法子便放起火來燒坦拿 (thana)，不論他們如何乞憐，都一概置之不理，因而好些警察便在裏面燒死了。論起這事的起因本由於警察，而不合作運動的義勇團又沒有參加，那麼甘地儘可聲明他不負責任。但是他已成爲印度的良心，無論他的同胞中任何一個人的罪過，都足以阻礙他的進行。他把印度全國人民的罪，都負擔起來。這回的暴動，使他發生恐怖而至於立刻停止他方才所主張的反抗運動；這已是第二

次了。這一次的情形，又較孟買的暴動的情形更爲複雜得利害，而他給印督的哀的美敦書又剛在數天前發出，如果他想把那封書收回來，那不是表示他的動作是不合邏輯而且是可笑的麼？甘地說：「撒旦阻止牠！」他知道撒旦的聲音是「虛榮」所以他竟不顧這虛榮而決定收回他的宣言。

因此，在一九二二年的二月六日，印度青年報上便有一篇最奇特的文章發現。這篇文章是甘地的 *mea culpa* —— 他的認過書。由於他抑制情慾的心的深處湧出來的感謝的言詞，都從他的唇上說出來；他感謝上帝，因爲上帝貶責他：

上帝對我的慈愛，是很隆厚的。他已經警告我三次，說印度尙未有那一種誠實和不暴動的空氣，不能實行反抗，因爲惟有那種空氣，才可認許我們的反抗。這種反抗，只有「文」之一字足以形容牠，「文」字的意義是溫存，誠實，謙卑，聰慧，堅決，和慈愛；而毫沒有犯罪或憎惡的意味。第一回的警告是在一九一九年，正當羅拉德案的暴動 (*Rowlatt Act agitation*) 初起的時候。亞米達巴得 (*Ahmedabad*)，維蘭甫拉格 (*Viramvrag*) 和克達 (*Kheda*) 都走

錯了路途。我反身走回來，並呼牠爲一回希馬拉雅的失算。我在上帝與人的面前，責備自己，並不單是停止羣衆的文的反抗，而且我自己的……第二次上帝乃由於孟買的事變給我一回可怖的警告。他使我自己親眼看見……我宣告我已決定停止將在巴多利 (Bardoli) 地方實行的民衆的文的反抗運動。這回的事，較之一九一九年的事必定要受更大的責罰。但是這祇是使我好，並且我相信印度必要因此而得益。因反抗運動的停止，印度正可表出她是擁護真理和不暴動的主義的。

但是最痛苦的責罰仍是免不了的……上帝由於綽里綽拉 (Chauri-Chaura) 的事很顯明地說出他的旨意……當印度自稱爲不暴動的，並想由於不暴動的方法以求達到自由的寶殿的時候，民衆的暴動，就說是對於劇烈的刺激而發作，也是一種不祥之朕兆……我們想要由於不暴動的方法以求自治，那麼，我們必先表明我們能用不暴動的方法來鎮壓國中的暴動份子了，因此，不暴動的不合作運動者惟有等到能管束印度的胡利岡 (hooligan)——暴動份子時，才能够成功。

故此，他便於二月十一日在巴多利 (Baroli) 把他的懷疑和困難的緣故，告知國會的常務委員會。他們並不完全和他同意，可是甘地說：「從來沒有一個人和他一樣的受同僚的人諒解和寬恕。」

他們表同情於他的疑懼，並如他所請求的，應許暫停反抗的命令並同時催促一切的組織都應培成一種不暴動的空氣。

我曉得我這樣猛烈地全盤推翻這進攻的程序，在政治上的策略看起來，是不對的，是無意識的，但從宗教上的立場上看起來，卻是正當的。由於我個人之責罰和認過，印度全國必將得到利益。我所要求的唯一的效果是真理及和平。那超於人之上的權力，並非我所得，而我也並不需要。我所套上的能腐壞的肉體，也和那最薄弱的兄弟所套上的一般，因此，我當然也免不了有過。我所能服務的，也必然有很多的限制，但是至於現在，上帝還賜福於我所做的事，而不顧其所不完全的地方。

因為承認一己之過失有如是一把掃帚掃去了表面上的塵埃，使牠清淨和明潔。我因我

的認錯，而覺得更有氣力。並且我們的事業，也必因後退而興旺。沒一個人在他已經走錯了正路後，仍是固執地前進，會達到他所期望的處所。有人說道：綽里綽拉（Chauri-Chaura）的事不能影響於巴多利（Bandoli）……這一點我的確是相信。在我的意見中，以為巴多利的人民是印度中最和平的。但是在印度的版圖上，巴多利不過是一小黑點吧了。除非是其他部分都完全和牠合作，牠是一定不會成功的。……如果有一厘信石放入一罐牛奶之中，那牛奶必不能供為食糧；因此，綽里綽拉的致命的毒質，也使巴多利的文雅化為無用的了。……綽里綽拉之可代表印度，也無以異於巴多利。總而言之，牠是一種激怒的象徵。在文的反抗之進行中，應該沒有憤怒之存在。文的反抗是一種為沉默就難的預備。牠的效果雖是溫和和不可驟覺，然而的確是可驚的。……綽里綽拉的悲劇是一種指示前路之手指。牠指明如果不十分細心，印度便會容易陷入的路徑。假如我們不願意從不暴動之中生出暴動來，那麼，很顯明的，我們便應該後退而重新創立一種和平的空氣，並在我們未十分相信反抗運動進行後雖有政府的挑撥也必沒有暴動發生之前，我們便不該想開始進行文的反抗的步驟……請讓反對

我們的人因我們的責罰——也即一般人所稱呼為失敗——而得到榮耀吧。我們寧願人說我們是怯弱的，而不願因否認我們的誓言和罪過而干犯及神。

他又要贖回他人所流的血。

我必定要清潔自身。我應當使我自己成爲一種更合適的儀器，足以測量在我四週的心靈上的空氣的最微小的變動。我的禱辭必定要有更深的真誠和謙遜。由我看起來，禁食是一種最可清潔我自己的方法。若爲使真我更完全地表現出來，并爲使個人的靈魂戰勝他的肉慾而禁食，則禁食在於個人的進化之中，是一件最有力的因子。①

①這幾句話，銘刻着他的人民的一切的情感，是多麼可以表示出他的神祕的力量！

他遂接連地繼續禁食五天。他不要他的同儕都跟着他這樣做。他應當責罰他自己。他說：

「我所處的地位，正如一位大夫，已經收納了一個危險的病症，而想不出法子來醫治他一般。我只好褫奪了我的職位，或是再求更深的技術了。」他的禁食，一面是爲他自己的懺悔和責罰，一面是爲責罰那說出他的名字來犯罪的綽里綽拉（Chauri-Chaura）地方的暴動的人。甘地

雖是情願自己受難，但他仍勸他們都自動地向政府自首，因為他們已經傷害了他們所欲服事的事業。他說：

我願意自己受種種屈辱，苦楚，永遠的流刑，或至於死，以使不合作運動不致於暴動或不致於為暴動之先驅。

在人類的心靈上的進步史之中，要找出幾頁像這樣的偉大的舉動是不可能的。這樣的舉動，牠的心靈上的價值是無可比匹的，可是如果當作一回政治上的運動看起來，那便是羞愧得很了。甘地自己也承認說：「在政治上的策略看起來，是不對的，是無意識的。」他把全國的力量都集齊起來，提心喘氣地等着做成那已經規定了的動作。他舉起了他的兩手，想下動員的命令，可是在最後的一瞬，他竟放下了兩手，并第三回命這一付已經活動了的大的機器停止，而冒險去破壞那活動的輪機和阻塞那原動力，這是多麼危險的一回事呵！

故此，當國委會於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在德里（Delhi）開會的時候，甘地的主張便受否決。巴多利常務委員會在十一日所表決的議決案，皆不經討論而不加追認。不合作運動者

因而分裂成二個營壘，甘地主張在文的反抗施行之前，人民應該有更完全的準備，他并呈出一方建設的計劃。但是有很多會員忍不了這麼遲緩的獨立運動，而反對停止文的反抗。他們說甘地的方法是阻塞全國的熱情。又有的提議要責罰常務委員會，并主張取消牠的表決案。可是到終局，甘地終是勝利。但他自己已難受得利害，因為他曉得大多數的份子都不是真誠地幫助他，他曉得那投票贊助他的人有不少在背後說他是「狄克推多」。他也澈底地知道他已不能反映全國的情感，并在一九二二年的三月二日，憑着他大無畏的至誠，說道：

暴動的暗潮，故意的和非故意的，既然已是如此之洶然勃起，那我所祈求的，不論從實際上或字義上解釋起來，也無非是一回可怕的失敗！我常常站在少數份子那一方面。在南非洲，我起來的時候是由衆人一致的擁護，到後來，至剩下六十四人的少數份子，而此六十四人，到末了只剩下十六人，可是到了終局，又恢復成爲大多數。那最完美和最堅固的工作，都是由那少數的人做出來的……我曉得政府所怕的惟一的東西是那好像是在我指揮之下的大多數；他們并不甚曉得我怕這大多數還要比他們利害。我對這無思想的羣衆的敬仰，真是討厭

得了不得。假如他們敢放膽來批評我，那我更可以明了我自己的地位。有一位友人警告我不要利用我的「狄克推多。」我自己便開始推想究竟我是否已無意地使我自己爲他人利用。我承認我自己現在對於牠的恐怖，的確是比以前更爲利害。我的惟一的安全，只賴着我自己不願恥辱。我已經警告委員會中我的朋友，說我是不可改化的了。每次人民犯了罪過，我將要繼續爲他們認罪。在這世界上，我只接收一種威權。這便是存於內面的一微音。一雖至於我只有一個人的少數，我仍謙遜地相信在這個無希望的少數中我仍是有勇氣。這由我看起來，這正是我唯一的真正的地位。但是我是一個愁悶的人，並且是——我所希望的——一個在今日的較爲聰慧的人。我看出我們的不暴動的主張只是一種皮毛之說。我們都是怒火中燒，而政府又再由於她所不自知覺的舉動，於這火上加油。這樣好像是政府盼不得這一片土地都蓋滿了殺戮，放火，和劫掠，以使自己再可獨操權力來把她征服。

故此，像這樣看來，我們之主張不暴動，也好像是因爲我們不能暴動的緣故了。我們好像是各人心中都隱積着復仇的心願，祇等着時機發動了。這樣的不暴動，是弱者不得已的不暴

動，那裏能產出真正的自動之不暴動呢？那麼，我可不是作一回無用的實驗麼？要是等到我們的怒氣爆發的時候，各人都舉起手來反對他的同儕，無論男婦孩子，都不能安寧，那竟成一種什麼景緻了？倘如我爲這種禍災之來而禁食以至於死，又有什麼用處呢？請我們都開誠布公的說吧。假如我們想用武力來求得自主，我們現在便應放下了不暴動的主張，而實行現出我們的武力來。這樣，才算好男子忠誠和乾脆，而沒有人敢批評我們是詐僞的。○倘如是不管我怎樣的警告……大多數的分子不相信我們的目標，雖然他們一點也沒有變更地接納牠，那麼，我將請他們實現他們的責任。他們並不是規定往反抗那條路走，而是應當坐下來作靜的建設工夫，假如我們再不細心，我們也許便會墮入那我們所不知道多深的河裏了。

○甘地已知道在大多數的分子中有很多人心中不贊同不暴動的主張，但以牠爲一種求達於暴動的步驟而贊同牠。他說他們溫和地說要把不暴動推翻。甘地并不像太戈兒一般，老早便看出了這種危險。但是他也有了一個時候忽然地覺悟了，在這時候，他反對大多

數人的態度，此太戈兒還未得粗魯。

因此，凡是不信這種教條的，便應該斷然退出這個會議。

甘地又轉說到那少數派的份子，他說：

愛國的精神要求忠誠和嚴格地依從不暴動的主義和真理，凡是不相信的，都應當退出這個會議。

在這樣有力的言辭之中，有一股很沉痛憂愁和慷慨豪俠的氣概。這就是在客西馬尼之一夜，甘地的被捕就在旦夕。誰能知道在他的心中，他不把囚錮看爲一種解救呢？

3

甘地老早已經料到他要被捕了。自從一九二〇年的十一月十日一切的事就早安排定，他自己也豫備入獄。他寫了一篇「假如我被捕了。」的文章，以訓令他的人民。在一九二二年的三月九日，他被捕的空氣又緊張起來的時候，他又寫了一篇文章，裏面也有關於這豫料可發生的逮捕的話。他說他并不怕政府。「政府雖一事塗戮以至流血成河，也不足以使我恐懼。」他唯一

所怕的事，便是恐人民聽見他被捕的消息，而不能壓制自己的憤怒。這是他所羞恥的。「我願人民都能維持完全的自制，而把我被捕之日，看爲一個歡樂的日子。政府相信我是一切鼓動的靈魂，假如把我移去，則一切將歸於平靜。故此，倘如我被捕了，剩下來的一件事便是要讓牠去測量民衆的力量。請民衆都保守完全的和平和安靜。假如政府因爲恐怕致成一方普遍的暴動而不敢捕我，那便是我的恥辱，而不是我的喜樂或榮耀。」請民衆把全盤建設的程序實施出來。不要作示威運動，也不要和政府合作。法院和學校都要一律抵制。簡單說一句，就是請人民都依循絕對的程序和訓練，去實行不合作運動的程序。假如人民都能這樣做，他們必將勝利；倘如不能，則將有莫大的災害。

當一切都籌備好了的時候，甘地便從容退歸與亞米達巴得 (Ahmedabad) 鄰近的薩刺巴馬地學院 (Ashram of Sarbarmati)，在他所親愛的信徒之環繞之中，靜默沉思，以等候警察之臨到。他極盼望入獄。在他離開的時候，印度必能以更大的力量以求達她的目標。并且他又說監獄將給他一個安靜的，和肉體的休息；這或許是他所應得的。(一九二二年三月九日。)

在三月十號夜，警察到了。在他們未到之先，便有消息傳到學院。甘地已是豫備好了，他便從容將身交給他們。在赴監獄的道上，他遇見了他一位回教友人摩哈尼君 (Maulana Husrat Mohani) 從遠道跑來和他作最後的擁抱。印度青年的主筆班克拉 (Banker) 也和他的主人一同受捕。甘地的妻只能跟他到監獄的門口。

在三月十八日，禮拜六的下午，甘地的一偉大的庭訊「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印度青年上有偉大的庭訊的記載。」便在亞米達巴得 (Ahmedabad) 的地方庭推事普魯布斯非 (Mr. O. N. Broomfield) 之前執行。那真是一方稀罕的尊榮和高貴的盛況。推事和被告人互相爭示狹義的禮節。在爭鬪之中，英吉利從未曾比這回更能示其寬大無私的胸懷。在那天，普魯布斯非推事替政府承認了很多過失和表示歉意。這經過的一切程序，因為記載已是很多，這裏只能概述幾點主要之點。

為什麼政府到末了終把甘地囚禁呢？為什麼牠考慮了二年，并不動手，而專在甘地已把羣衆的運動平息，并爲防止暴動的唯一的屏障的時候，才把他囚禁呢？這是否是反常的舉動抑是

牠專要實行甘地所說的可怕的話：「這樣好像是政府盼不得這一片土地都蓋滿了殺戮，放火，和劫掠，以使自己再可獨操權力來把她征服。」呢？政府是居在一個很困難的位置，牠一方敬仰甘地，而一方又是懼怕他，牠本可以溫和地對待甘地，但是甘地並不溫和地對待牠。甘地責罵暴動，可是他的不暴動比較任何暴動還來得激烈。在他停止文的反抗的民衆運動之同一日，或是在德利（Delhi）會議之前一日——二月二十三日——他對於大不列顛的威權寫了一篇最富恫嚇性的文章，貝根赫德伯爵（Lord Birkenhead）并蒙塔鳩君（Montagu）所發的一方傲慢的電報，對於印度無異爲當頭一棒。

○「假如印度對於我們的帝國的存在挑戰，假如印度依着無所憑據的心理，以爲我們正在考慮退却，因而阻止英國政府對於印度所必履行的職務，和作種種要求，則印度這回的挑戰，必不能達到成功，因爲她是對世界上最剛毅的民族挑戰，這民族必立刻再度鼓起牠所有的氣力和決心來對付她。」

甘地於暴怒之中，立即回應這樣的挑撥。

當不列顛的雄獅繼續地在我們的面前擺舞牠的沾血的爪牙的時候，那裏能說到什麼講和呢？不列顛帝國是建立於對於物質上困弱的民族爲有組織的侵略，并繼續地爲暴力的張揚之上，倘如世界上果有一個公正的神管理着宇宙，則她必不能生存……就在這個時候，我們要使英國的人民知道這從一九二〇年所開始的戰爭，是一個拙個最後的死的戰爭，不論牠將歷過一月，一年，或是很多月，很多年。我唯是盼望并禱求上帝給印度以充分的謙卑和充分的力量，使她能維持不暴動以至於終局。如果要我們對於這種傲慢的挑戰表示屈服，那在現在是一件絕對不可能的事。

甘地被告的緣故，便是因爲他在這篇文章中所說的話，和在其他二篇——是在一九二一年九月十九日，一是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所說的那二篇文章，一是說及阿里 (Ali) 兄弟之被捕，一是答復勒定伯爵 (Lord Reading) 的演詞。這兩篇文章中都有同樣的宣告說：「作個拚個最終的死的爭鬪。我們要自主，我們要政府接納民衆的意志。我們并不請寬赦，而也不盼望什麼寬赦。」（按「寬赦」是戰爭時收容被虜的敵人的術語。）故此，甘地

被告的罪名便是：「宣傳內亂并煽動他人推翻政府。」甘地自己作自己的辯護人。他對於這告訴他的一切罪名，都不加辯護而宣告承認。

孟買的檢察官斯特棧治曼 (Sir J. T. Strangman) 聲稱這三篇爲被告原因的文章，并不是分離的，而是這兩年來以推翻政府爲目的的運動中之一部分工作。他摘錄甘地的文章以證明他的話。他對於甘地的品格的高尚，極爲稱許，但此適足以示明其文章之重要，而反增加其犯罪之効力。他把孟買和綽里綽拉的流血，都歸咎到甘地身上，要他負責，甘地宣傳不暴動，固然是真的，但他同時也宣傳叛逆。故此，他對於人民所爲的暴動，應當負責。

甘地要求允他發言。在這過去的幾個禮拜中，他因徬徨歧路，莫辨是非所受的痛苦，憂慮，懷疑，和智靈之交戰以定他所應走的路徑，并其對人民所必發生的影響等等，都已豁然明晰。他已經把他靈魂的安靜恢復了。他承認過去一切發生的事，和將來所應發生的，都是一種必須的事。他對於這種事件之發生，固然抱憾，但是這是他的責任所應做的。他和檢察官表示同意。他是應負責的。他是應對一切的事件負責的。他宣傳叛送的年期，還不只如被告的主辭中所述的年

限。他負起了瑪德拉斯 (Madras) 的變故，綽里綽拉 (Chauri-Chaura) 的「凶暴的罪過」和孟買的「癲狂的暴動」的責任。

那有學問的檢察官說我是一個已經受過充分的教育，有充分的經驗，和一個有責任心的人，應該明白我每一次舉動的效果，這是十分對的。我知道我是與火爲戲，我是冒着危險，并且，假如我被釋放，我仍將這樣做。今天早晨，我覺得倘如我沒有如剛才所說的話說出來，則我必無以完成我的責任。

我以前是要避免暴動，如今也仍是要避免暴動。不暴動是我的信仰中之第一條信條，而也是我的訓示中的最末一條教條。但是我應當作一方選擇。我必定要降服於一種我以爲對我的國家作不可修補的損害之制度之下，或是甘冒那人民於明了從我口唇中所說出來的真理的時候，而奮起的狂慢的暴怒之危險。我知道我的人民有時竟致於猖狂。這誠使我深深地抱憾；故此，我特在此獻身受刑，不是受輕微的刑，而是受最重的刑。我并不乞憐。我并不請求減輕我的罪名。我在這裏邀請和喜樂地就那對於法律所認爲「一件故意的罪過」而在我

則認爲「一個公民的最高的責任」所應施的最重的刑罰。審判長，你唯一可走的路便是辭去你的職務，或是對我施以最嚴酷的刑罰。

這一方有力的言詞，使一種宗教上的精神所具有的疑慮，爲一種政治領袖的義俠的堅決所均衡；因而在說完這一方話一後，甘地便當衆誦讀一篇對印度和英國民衆發出的宣言。他說，他不得不對他們說明他何以由一個「堅固的忠臣和合作者」變爲一個不妥協的反叛者和不合作者。自從一八九三年，他便從事於政治生活。他指出他以其爲印度人之身分在英國制度下所受的一切痛苦，并說他繼續不懈，作二十五年之嘗試以使他改良。他堅決地相信這不必把印度和英國分開，便可做到。所以不顧一切的好謀，至一九一九年，他仍是一個堅固的合作者。但是從茲而起，苛刻罪戾之事已至人不能堪。政府不但不自修補前尤，且又高升和賞賜牠的犯罪的奴僕，好像是專要和印度的精神作對。政府自己已使一切的癥結更爲緊張。因而甘地便斷定就是政府現刻即建議他所冀望的改良的計劃，也必成爲禍害的。在印度的英國政府，是建立於侵略民衆之上。法律之創立都是以擴張這種侵略爲目的。法律之執行，都是故意地或非故意地

爲侵略者之利益而運用。一種機巧而有效力的恐嚇制度和一種有組織的武力之炫耀已把印度的人民闖去了勢，并在他們中間造應了一種顛倒是非的習慣。印度已是饑饉崩潰和墮落。有很多人說印度必將經過若干年代，才能有完全自治的能力。英國對於印度所施的災害，比較以前任何制度，都爲重大。因此，和罪惡不合作便是一種責任。甘地已履行他的責任了。但是在過去中，不合作所故意地表示的形式是對作惡者施以暴動的刑罰，暴動便是最高的武器。甘地則給他的人民以一種新的，可是不能被勝服的，的武器。這武器便是不暴動。

接着便是普魯布斯非特推事 (Judge Broomfield) 和麻哈德麻 (甘地) 互爭其俠義的氣節：

甘地先生，固然一方你因承認你的犯罪而使我易於着手措施，但是，還有一件事，如何處以適當之刑，這也或者是一件一個在這國中爲推事的所能遇見的同等困難的事……在你的億兆同胞的眼中，你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和一個偉大的領袖，這種事實，是不能否認的。就是那一般政見和你不同的人，也把你看爲一個有高尚的理想，尊嚴，甚而有聖人之生活的

人……但是依我的責任，我必定把你當作一個受法律所統治的人而判你。你的行動，使任何政府都不能與你以自由，這在印度的人，不誠摯地爲你而抱憾的，實是很少。但是事實已成往然了。我現在只有依我所能見的，設法權衡你的功過而定罪。

他很有禮貌地和甘地商酌他所應受的刑罰。「我想把你和提拉克君 (Mr. Tlalk) 並列，處以十二年的徒刑，而先折定爲六年的監禁，你不以爲不合理吧，」「假如在印度的時勢能使政府縮減你的年限而釋放你，那沒有一個人能較我更爲歡快的了。」

甘地不讓推事以禮貌把他制服。他說他的名能附連於提拉克的名字，是他最可自誇的權利和尊榮。單就處刑一項而論，他以爲這是任何推事最能定的極輕的刑了；而對於訊問時的禮貌，他說已是極滿他所能盼望的了。①

①印度青年的主筆班克拉克君 (Mr. Banker) 於訊問中也依着他主人的模樣，承認他——應所說的，并受判定爲一年之徒刑並罰金。

庭審遂宣告終結。甘地的朋友都撲俯在他的足下哭泣。麻哈德麻含笑離開他們。薩刺巴馬

地 (Sarbjimati) 的獄門便在他的後面關閉了。

○甘地夫人以一片極美麗的消息將甘地所受的處刑報告印度的人民，並請他們保守和平並靜默地集全力量以實行甘地的建設的程序。

甘地在薩拉巴馬地的監獄中受很好的待遇，但沒有多久，便被移入一個不知名的監獄，然後再由彼處，移入與浦拿 (Poona) 相鄰近的約拉維達 (Yeravda)。依據一九二二年五月十八日協和 (Unity) 報上所登之哈狄克 (N. D. Hardiker) 君所作之甘地在獄中一文，他所說的——我們尚不能證實——甘地在獄中也如常犯一般看待，並無什麼特別的照顧，因而他的困弱的體格，不免受其磨難。

「提及甘地的囚禁，安得魯 (Mr. C. F. Andrews) 君告訴我說麻哈德麻在獄中甚為歡樂，他請他的朋友不要去見他。他正在清潔自己的身心，他禱告，並覺得這樣他是依一種最有成效的方法為印度服勞。」

安得魯君無意中說及在麻哈德麻入獄之後，甘地黨在印度更增其勢力。印度以加倍

的熱誠相信甘地。她繼續地把他視為斯里克里斯拿 (Sri-Krishna) 的化身，斯里克里斯拿 (Sri-Krishna) 在生時，也是受過拘禁的。在監獄中，甘地防止他所恐怕的暴動，比較他自由時還更為有效。

4.

在甘地被囚之後，他的聲音遂不聞於外。他的肉體被囚於牢獄，好像是在墳墓中一般。但是從來墳墓并不能禁絕思想，所以甘地的不可視見的靈魂仍為印度昂大的身體的氣魄。「和平，不暴動，受苦」^e就是從獄中出來的唯一的消息。這消息已經傳播開去。從這國內一端至於彼端，都有這樣的警句張貼着。在三年前，假如甘地被禁，則印度必流血遍野。在一九二〇年，單是一片他被囚禁的謠言便使民衆暴動。但是亞米達巴得 (Ahmedabad) 之處刑——甘地受判之處——却於一種宗教式的嚴肅中接納了。有千萬個印度的人民，於恬靜的歡樂之中把他們自己獻交監獄的牢卒。不暴動和受苦——驚人的事件愈出愈奇——可以表明那神聖的話是如何地深深透入於全國的精神之中。

○在一九二二年的八月三日，協和報發表一篇「從監獄中寄出來的信」，信中係甘地敘述現代文明的弊端的話。由我看來，這信是可疑的。我不得不幻想牠是一篇從甘地以前所作的短文中，特別是印度的自主一文，縮短出來的。

塞克人 (Sikh) 如大家所知的，常被視為印度的最富戰鬥性的民族。在歐洲大戰中，有很多塞克人在兵隊中服務。在去年，他們中間發生了內訌。由我們歐洲人看起來，牠的起因是很微小的。在一回執行宗教盛典的結果，有一派塞克人名為阿開里斯 (Akalis) 的想要潔淨聖所。這種聖所，是在一班名譽不好的看守人的看管之中；他們拒絕把聖所交出。因為法律上的理由，政府便為他們保護。因此，在一九二二年的八月便發生革魯開巴——一個在革哇拉 (Gardwal) 地方的聖所——的逐日的屠殺。阿開里斯人 (Akalis) 採用不抵抗的主義。他們中有一千人在聖所的左右駐紮，四千人在離開十哩地的阿木里普爾 (Amritsar) 的金廟 (Golden Temple) 中寄住。每日，有一百個壯丁，很多是歷過戰爭的，從這金廟中出發。在未出發之前，他們應作下列的宣誓：在思想上，在動作上，從這裏到革魯開巴，或從那裏失了知覺被抬回來，都真誠

地信從不暴動的主義。在那駐紮鄰近的一千人中間，每日也有二十五人出發。在出發之前也作同樣的宣誓。在離開那聖所沒有多遠的小橋上，英國的警察帶着冒上鐵鎗的木棒以阻止他們的示威。因此在那裏每天都有一幕可怖的惡劇發生，太戈兒的朋友安德魯 (Andrews) 君在他的阿開里的爭鬪一文中，很深刻地描寫這幕劇情。⊙在他們的黑色的頭巾的周圍，圍上了一圈細的白花，很靜默地他們走到警察的前面，差不多離開有一碼遠近的距離，便停止并無聲無響地禱告。爲的要趕他們離開，警察使用鐵鎗刺戮他們，直至流血暈倒才止。那稍站得住脚的，還是繼續地禱告，以至於和其他的塞克人一樣的暈過去才停。安德魯 (Andrews) 君並沒有聽見一聲呼叫，也未曾看見他們的臉上露過一回怒容。在左近有一羣觀衆，他們的臉上呈一種痛苦的顏色，但仍是靜默地禱告。安德魯 (Andrews) 君說：「我不能使我不想起十字架的形影。」英國人在他們的報紙上記載這種情況，并表示駭異。⊙這雖好像是他們所不能了解的，但是他們不能不承認這種無意義的犧牲可以證明不合作和不暴動的觀念已漸得人信從，并且般遮布 (Punjab) 的人民已完全相信這主義了。具有俠義的精神和純粹的理想而能看穿印度的

靈魂的安德魯 (Andrews) 君說他在這裏看見如哥德 (Goethe) 在發爾米 (Valmy) 所見的，「一個新世紀之黎明。」「一種受苦楚所磨鍊得好像鋼鐵一般的新英雄主義出現，一種精神上的戰爭。」

① 阿開里的爭鬪 見一九二二年九月一日瑪德拉斯 (Madras) 的沙拉雅 (Suaraiya) 作者安德魯君 係聖提尼格丹 (Santiniketan) 的教授。

② 見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三日的 Manchester Guardian Weekly

印度的人民，好像是較那專為指導民衆的人更能忠誠地依從麻哈德麻的精神。我已經說過在甘地被囚之二十日之前國委會在德利 (Delhi) 開會的議席上所發表的反對甘地的話了。這種反對的論調，在國委會於一九二二年六月七日在勒克瑙 (Lucknow) 再開會時，又再發生。甘地所提倡的忍耐等候和靜默的改造的程序受很激烈的批評，因而決議宣告文的反抗，並在會中選出一個委員會以調查國中的情況，並決定實行文的反抗的時機，是否成熟。這委員會旅行過全印度，並在秋間寄回了一篇失望的報告。不但文的反抗被宣告在現在是不可能的，

而且又有一部分委員走入了極端保守的路，提議取消甘地的不合作的方法并在政府的參事會之中另組一個自主的黨。換句話說，甘地的主義，一面受那班相信暴動的人攻擊，而另一方面又受那班穩健派的人攻擊。

可是，印度并不接納委員會的報告。在一九二二年的十二月末期間，印度國民會議開常年大會，劇烈地宣告服從在拘禁中的領袖并他的不合作主義，并以一七四〇票對八九〇票否決參與政府的參事會。那相信暴動的人，為數無幾，所以也沒有影響。該會閉會時并一致表決甘地所命令的政治上的怠工應繼續進行。但是，那抵制英國原料的議決案，却因恐怕對歐洲的工人激起反感的緣故而付以否決。但那哈利發的回回會議，常常較國會為有膽量的，則以大多數的票決贊成抵制。

在這裏，我們應將甘地運動的記載作一結束。雖然因甘地和他的最優越的信徒如他一般的被囚，（特別是阿里（Ali）兄弟，）因而便不得不然的有少數背教的人離開，可是在這一個無人領導的年頭，不合作運動還是勝利地前進。在一九二二年該阿（Gaya）會議閉會之後，英

國的報紙對於這運動之發展表示驚奇和煩惱。①

①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協和報上發表瓦特孫 (Blanche Watson) 一篇文章，敘述印度由於不暴動的抵抗所得勝的利益。

這篇文章說印度的國內的淨利已大約減去七十兆圓，而因為抵制英貨的緣故，英國在一年中之損失，已達二十兆圓。她說在他寫那篇文章時，已有三萬個印度人被禁，政府也因以擾亂不安。但是瓦特孫 (Watson) 是一個熱烈的甘地崇拜者，或者有一種不知不覺而擴張其辭的趨勢。其他的證據像是沒有這麼樂觀，并證明犧牲的精神已為那富人和商人的自私自利的態度所阻礙，同時，那因一時的熱烈的情感之作用而放棄政府的官職者，也有好些歸回去工作。其他更壞的消息，使非仁者所可信的了。在每一回革命的過程中，必有好些落後的，或是背送的。可是我們所要決定的是大體上那運動是在增進或是在降底的途徑。關於這點，我們請參閱一九二三年二月十六日曼徹斯特護導週報 (Manchester Guardian Weekly) 上的記載。

曼徹斯特護導週報是以其智識的自由主義聞名的，可是，牠也代表某種直接受不合作運動所損害的勢力，所以，最近牠組織了一個調查團，以調查印度的狀況。我們讀牠的報告而得到的結論，雖然是自然地有一種不信任這運動的趨勢，可是不得不說大概的情形尙是嚴重和可慮。那最末的一篇記載——（一九二三年二月十六日）——想證明甘地的策略已是不行，不合作運動必須改組。但是那文中又說不合作的精神仍是繼續發達。在各處都有不信任外國政府和熱烈地盼望消滅牠的表示。在印度中大多數受過教育的人民和大城市中的居民都同意於這一點。農民受這運動的影響雖是很輕微的，但是農村的狀況已使他們不得不於短期間內表示贊助。軍隊還好像是沒有受影響，但是新招的兵是從農村間來的，所以終局也必爲所染及。在優秀的和最中庸的份子中間，不合作運動常是很緊張的。這種份子反對革命的方法，但是國中其他部分的人並不和他們同意。作者並說印度要經過十年之後，才能實行有效的文的反抗。但是在這時，各處的情況已經步步趨於嚴重。要想用監獄來恐嚇印度人使他們停止動作已是不可能。

了。他們現在並不怕監獄。更苛刻的法子應當被採用，但是如果採用，必要激起敵愾。所以在目前只有一種解決的方法——假如是太遲了的話——這方法便是英國自動地改良印度。可是到去年，這種改良還不及一九一九年之一半！這是不充足的，所以，更不是該耽誤了時機。英國應當召集一個印度的國民大會（National Indian Convention），在這會中，凡印度一切的黨派和實力都應派代表——甘地和他的門徒，印度皇子，歐洲資本家，回回教人，印度教人，帕爾西人（Parsees），歐拉西亞人（Eurasians），基督徒，和帕里亞人——共同組成這個大會，以起草在英帝國中的自由印度的憲法，并劃清這種自治的權限。這便是防止帝國崩潰的唯一的。方法。我不曉得印度和英國的當局對於曼徹斯特特護導報的建議採取什麼態度，可是我很難相信甘地和他的不合作運動者會同意與歐洲和印度的資本家同席會議。但是有一件事是可確定的，這便是：沒有人敢再懷疑印度的自治權了。無論由於何種路徑，這是終要達到的。并且，沒有一件事比較英國在甘地的運動發生後改變她對印度的態度更可注意的。歐洲的人已不再罵印人，而是厚

重地看待他。在往昔，政府所採用的方法第一便是暴力，可是現在無論何人都說這是一種錯誤。由於精神上和智慧上觀察，印度已是得到勝利了。

5.

以後又是怎樣呢？由於過去的經驗而更爲有智慧的英國，能否知道如何消滅印度人民的渴望呢？並且，這人民能否保持她——印度——的理想呢？國家的記憶力，是短促的，所以，倘如甘地的主義不是印度民族的最深和最久遠的渴望之表現，則我對於印度對於甘地的教義的信仰力的信仰，也是很薄弱的。因爲，倘如世界上有天才這件東西，不論與其環境的理想是否相同，而自賴其力以成其偉大，也斷沒有一種作事的天才或領袖，不依其民族的本能，而能滿足時代的需要和平息世界的願望的。

麻哈德麻甘地做這一切的事。他的亞喜米沙（不暴動）的主義之刻入印度的精神已經有二千多年的工夫了。馬哈維拉（Mahavira），釋迦，和維士努（Vishnu）的儀禮已把牠做成爲千萬個靈魂的實質！甘地不過是將牠注入了一種英雄的血液吧了。他奔入那沉睡的靈魂的

境地，呼起那大的幻影和過去的氣力，在聞見他的聲音的當下，他們都醒過來。在甘地的身上，他們覺得自己的存在。甘地已不單是一個名字，他是一個模範。他是他的人民的精神之化身。祝福這個全民的現身的人，他的人民，已入了墳墓，又在他的身上復蘇了！但是這樣的復活從來便不是偶然而發生的。假如印度的精神從廟所和森林之下激湧出來，這便是因為牠帶來了世界所太息以求的消息的緣故。

這消息傳播出於印度的疆界之外，印度自己能作成牠，但是這須要獻出全國的偉大和犧牲，或許會成爲牠的十字架的。

因爲事理上好像是說爲着要給世界以新的生活，則一個民族必定要犧牲。猶太人已爲他們的救世主而犧牲，歷過許多年代，他們的思想中總有他的地位，可是當他流血在十字架上的時候，他們並不認識他。更僥倖的，印度已認出了她的救世主，人民都歡樂地走上犧牲的途徑，使他們自己獲得自由。

但是，像昔時的基督教徒一般，他們并不全明白他們解放的真意義。基督教徒，經過一個很

長的時期等候着天國之臨到。在印度，很多人的眼光只能看到自主的界限而已。我偶然地幻想這種政治的目標不久便可達到。歐洲因戰爭和革命而流血已是民窮財盡，而她的威權，在她先前所壓迫的亞洲民族的心眼中也，已一掃無餘，必不能長久在亞洲的土地上反抗醒回來的民族如伊斯蘭 (Islam)，印度，中國，和日本的志望。但是假如亞洲新湧起的精神不成爲一種新的生命，死亡和動作的理想，以及一切仁愛的車輛，假如牠不帶來了一筵新的送終的餐來催歐洲潰亡，則不論這新興幾個國家所加於「人類和協」中的「和協」是如何新和豐富，終是沒有什麼大意義的。

世界是受暴力之風所摧殘。這蹂躪我們文化收獲的颶風，并不是平空而來的。那歷過很多年代的殘酷的國家的虛榮，受那如偶像般受人崇拜的革命的觀念之磨勵，由於德模克拉西的空虛戲弄，而終因經歷過一世紀的無人道的工業主義，貪汙劫掠的富人政治，和一個靈魂已經消滅了，或是受悶而致死的物質化的經濟制度而達於成熟，遂不得不積爲這黑暗的爭鬪，而在這爭鬪之中，歐洲的財富也只有束手待其損害。要說這些事都是不可避免的，尙未足以表明其

意。其中還有一個雪恨復仇的意念存在。民族之相殺都是依着同種主義的名，而在這主義之後面却藏着貪欲和「該隱」（聖經上一個貪心的人的名字）的本能。不論是民族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布爾什維克主義者，被壓迫階級的人，或是壓迫階級的人，都說他們有採用武力的權利，而不讓其他的人有這種權利。在半世紀以前公理為強權所制服。現在，事情來得愈糟。強權便是公理，強權已把公理吞下去了。

在這舊和破碎的世界之中，沒有躲身之所在，沒有希望，也沒有大的光明。教堂給我們以無効力的忠告，儘管措辭措的很美麗，很細心，以免衝犯那有權力的人。并且，當牠忠告我們的時候，牠自己從未曾立一個模樣。這軟弱的和平者很可憐地呼叫，使我們覺得他們自己正在懷疑和捉摸，而他們所說的信仰，却已經不是他們所相信的了。誰要證明這信仰呢？并且，在這已經失了信仰的世界之中，他要如何證明呢？要證明信仰，只有由於行事。

這便是給世界的偉大的消息，如甘地所說的：印度的消息——犧牲自己。

太戈兒也曾重述過這同樣能感動人的話，因為在這可驕傲的原則上，太戈兒和甘地是同

意的：

我希望這犧牲的精神和受苦的志氣將發長……這便是真的自由。沒有一件事物比牠更爲高尚，國家的獨立也比牠不上。歐洲對於武力和物質的財富有一種不可搖動的信仰，故此，不論牠如何呼籲和平或縮減軍備，牠的兇暴的呼聲必是更爲響亮……我們在印度應當把什麼是真理告訴世界，這真理不但是能使縮減軍備成爲一件可能的事，而且又可化牠爲力量。心靈上的力量是一個較肉體上的力量更爲有力的勢力，這種事實，必要賴一個無兵力的民族來證明。生命的演進上示明牠緩緩地脫去了堅硬的鱗甲，和多量的肉，以至征服暴力的人出現。將來必有一個時候，那軟弱和仁慈的人，將絕對地不賴軍備，而證明溫柔將要傳受這地上的所有。麻哈德麻甘地以他困弱而沒有物質和財富之贊助之身軀，而能證明隱藏於受侮和窮困的印度民族的心中之温和和謙卑的「不可征服的力量」，這是合於邏輯的。印度的命運是連結於靈魂的力，而不是連於肉體的力。牠應當把人類的歷史抬高，把牠從在一個物質的爭鬪的紛亂之山谷裏，抬到一個精神的戰爭的高原上。雖然我們可借用歐西的字

眼來勉強表示我們的意思——自主——但是這還不是我們的真的鵠。我們的戰爭是一種精神上的戰爭，一種爲人類的戰爭。我們應當由於人類所作以自縛其身的繭中把他釋放，我們將使他從國家的自私自利的組織中釋放出來。我們應當告訴蝴蝶說：天空之自由是優於絲繭之窒梏。在印度，我們並沒有「國家」這個字眼。若是由於其他民族借用過來，則不適用於我們的需要；因爲我們應當和最高的神相連結，而我們的勝利，將爲神的世界的勝利……假如我們能把不滅的精神的權力示給世界，因以藐視那有權的，富的，和擁兵力的，則大的肉體上的宮殿必能崩倒成墟。要是這樣，然後人才能尋得真的自主。我們，被人排斥的困苦的東方的民族，正當爲人類而征服自由。

甘地說：「我們的目的是與全世界相親的友誼。不暴動已經來到人間，並且要留住。牠是世界上的和平的報告。」

世界的和平還是離開很遠的。我們尚沒有什麼幻覺。在這半世紀中，我們看慣了人類的偽善，怯弱，和殘酷。但這不足以阻止我們愛人類。因爲雖是在最壞的之中，尚有一種

*pinb oisen
pinb oisen*

Dei 存在我們知道盤住着二十世紀的歐洲的物質的束縛，和包圍着牠的經濟狀況之強制斷定主義；我們知道那經過很多世紀的肉欲，和得到同情的錯誤，已在我們的靈魂之周圍造成一層光明所不能透過的殼。但是，我們也知道精神所能做的奇蹟。

歷史家，我們已曾看見牠在比我們的天空更黑的天空中施展其威力使牠明亮。我們，不過有一日之生命，已在印度中聽到了息外 (Giva) 的手鼓的聲音。——「那掩蔽了他的圓大的眼睛，細心提防他的脚步，以救世界使免墮入於地獄的跳舞家。」

① 摘錄 Vishakadatta 的戲劇 Mudra Rakshasha 中的息外 (Giva) 的最舊的禱辭。

暴力的政治家，不論是革命的或是反動的，譏笑我們的信仰，并由此而表出他們不明瞭深的實在。讓他們去譏笑吧！我有這個信仰。我知道這信仰在歐洲是被咒咀并被虐待的；而且，在我們本地，也不過有幾個人——連幾個人也或許沒有吧！——相信牠。但是如果只有我一人信仰牠，也有什麼相干呢？信仰的真的品格并不是要否認世界之反對，而是要承認牠，并不顧一切仍是那樣相信。信仰是一場戰爭。我們的不暴動是一場最兇猛的戰爭。要達到和平的路并不是由

於軟弱。我們和暴力交戰還不及和軟弱交戰之多。無論什麼事物，不管是善是惡，倘如牠不是強健的，一定是沒有價值。絕對的惡是優於無能力的善。呻吟着的和平主義是和平死亡的鐘聲；是怯弱和缺乏信仰。凡是不相信的，恐懼的，都請退出吧！要達到和平的路是由於犧牲自己。

這便是甘地的消息。唯一所缺的是十字架。⊙人人都知道，倘如不是爲猶太人的緣故，羅馬必不會把十字架加在基督身上。不列顛帝國并不優於昔時的羅馬。動力已經賜與了。東方人民的靈魂已經在牠最深入的纖維裏面受感動，并且，全世界已都覺出牠的震動了。

⊙這是在英國中的「公正的反對者」所見的，并已漸漸地傳入他國。

這大的東方的宗教的怪象是受一種音律所調節。有一件事是確定的：要不是甘地的精神將成功，便是將來仍必再表現，如好些世紀前基督和釋迦之表現一般，至於最終而爲一種半神半人的表現，爲那將要引導一種新人類以入於新道路的生命之原則之「完全的化身」。

